

流求與「流求論」

杜正勝*

摘要

所謂「流求論」是關於中國中古時期文獻所稱的流求國之所在的論辯，是指明清兩代的琉球，亦即今之沖繩，還是指臺灣，或者兼含這兩個地方。這是 150 年來曾經激辯過而至今仍然沒有定論，還有不少人繼續論述的史學課題。

流求之所在，這個大歷史中的小課題，不限於學院內的論辯，也涉及現實的政治紛爭。《隋書》流求國傳的民族誌資料和隋帝國入侵的歷史，不只為史記闕如的臺灣和琉球（沖繩）填補歷史空白，甚至是她們文獻歷史的開始，也牽動臺灣、沖繩以及中國、日本的主權和領土的主張，經常反映在培養國民史觀的歷史教育上。

本文追本溯源，主要分疏琉球說、臺灣說和混合說三大派學者的歸類與傳承，他們論證根據的有效度，研究方法的特點與缺失，尤其指出在實證研究之下，潛藏於心內的主觀意識可能左右他們的客觀論證。

流求論辯，政治上固然一言可決，學術上在強而有力的新資料出土之前，恐怕難解。本文沒有在三派中選一邊站，毋寧藉這個大歷史的小課題指出歷史學從表層透及內裡的複雜性。

由於中國傳統對於海洋的陌生，即使有少數記載亦多模糊不清，如果勉強要追問我對流求具體態度，我認為明代以前大可不必強求確切的所在。

關鍵詞：流求國、流求論、南島、古琉球語、歷史的表層與內裡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2 年 6 月 13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9 月 1 日。

- 一、序
 - 二、「流求」：琉球與臺灣的糾葛
 - 三、既真實又縹緲的流求國
 - 四、歷史語言與考古民族學的背後
 - 五、唐宋傳聞：貿易之鄉與食人之地
 - 六、迷濛中逐漸浮現的琉球
 - 七、「流求」史論的表與裡
 - 八、文獻的圖像關聯歷史建構
- 後記
-

一、序

所謂「流求論」是關於中國中古時代所稱的流求，是指明代以後的琉球，今之沖繩，還是臺灣，或二者兼而名之？這雖不是什麼歷史大課題，但東西方史學界卻論辯了一百五十年，仍無結論；直到晚近，日本的相關學者猶興味盎然。因為憑藉的史料主要多是中國的記載，填補中國古代海洋史的一些空白，又牽涉臺灣歷史紀錄的緣起，說是臺灣史第一個待解決的問題亦不為過，對身為臺灣的史學者乃特別有意義。

「流求」之名，始見於《隋書·東夷列傳》，隋帝國曾發兵攻伐，俘虜不少男女，關於其國其人，諸如政治、社會和民族、文化等情狀，隋王朝史官留下頗為詳細的紀錄，收在唐初編撰的《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條內。此後歷代多有記述，或沿用「流求」，如《北史》、《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諸蕃志》、《宋史》、《通志》；或寫作「琉球」，如《通典》、《文獻通考》、《島夷誌略》；而《朝野僉載》作「留仇」、（《太平御覽》注作流虬）和《元史·外國傳》作「瑠求」，而八、九世紀的日本作「留求」或「流隸」則比較特別，至明洪武中寫作

「琉球」¹而定型。中國的相關地誌資訊大抵節抄自《隋書》，少有新聞，直到明代才有不同的認識。

明太祖遣使招諭東海上的琉球國以前，流求這個國度在哪裡？中國人多不求甚解，也很少能確指其所在。但親至其地之後，中國人則將歷史上的流求國和現實的琉球國合而為一，德川日本和清代繼之，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方學者始有異說，認為流求是臺灣，或也包含臺灣。終於形成三大派，即流求是琉球（沖繩）、是臺灣、或是兼含二者，日本學界的論辯尤其熱鬧。² 因為流求是琉球（沖繩）或是臺灣，牽涉今日領土歸屬與國家主權的敏感政治問題，歷史問題遂變成現實問題。學術論辯雖然憑證據說話，崇尚理性推論，其實不同指涉流求的所在，多少也會反應論者有意或無意潛藏的政治立場，凡此不同論述，即是本文所要追究的「流求論」。

百餘年來的流求論述意見雖分歧，即使實證史學之學者雖實事求是，卻多忽略和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的背景——中國傳統的海洋認識。這個問題我有專文論述，³ 本文從略。概括言之，傳統中國人對於東邊海域的了解遠比對南海的認識粗淺，知之不清；《隋書》關於東海上的流求記載自然模糊，才引起無休止的論辯。

本文著重將百餘年來論爭的派別加以梳理，指出他們立說的根據，分析他們研究方法的缺陷，並且試圖探索他們學術論述的背後可能潛藏的主客觀因素。

二、「流求」：琉球與臺灣的糾葛

對東海認識之模糊，到六朝唐宋雖有改善，但明代以前，基本上仍然不清楚，即使有所謂的認識，也很分歧，官方與主流社會比海濱庶民更甚。

¹ 尚象賢，《琉球國中山世鑑》（1650）曰：「洪武十六年更流求曰琉球」（〈總論〉），而徐葆光《中山傳信錄》（1721）「明永樂中改琉球國」（卷4「琉球地圖」）恐誤。分別參看尚象賢撰、沖繩縣教育庁文化課編集，《重新校正中山世鑑》（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82；1650年原刊）；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21年原刊），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745冊。

² 參山里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第二章〈隋書流求傳研究の論點〉，頁22-66。

³ 參國立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第三講「海國觀點的世界秩序」（2020年12月4日），演講文字出版中。

流求琉球說當推始於明洪武5年(1372)太祖遣楊載招諭琉球國，自此之後建立朝貢體制，雙方多有往來，中國人遂把《隋書》的流求等同於當時的琉球，英宗天順5年(1461)進呈的《大明一統志》(卷89)即持此看法。及至嘉靖13年(1534)陳侃出使琉球國，翌年完成《使琉球錄》，附錄《群書質異》，評點舊說，對《大明一統志》、《羸虫錄》和《杜氏通典》引述《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條的記述，頗多駁正，但陳侃並沒有否定琉球即流求的說法，唯以他的親身見聞指出舊史記載之訛誤而已。⁴

陳侃《群書質異》曰：琉球「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至太祖乃「首効歸附。」隋元二代事蓋指《隋書》〈東夷列傳〉和《元史·外國列傳》瑠求條的記載。《隋書》記流求風俗，如「男子拔去髭鬚」，「男子用烏羽為冠」，但陳侃所見卻是「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隋書》說：「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陳侃說無此事。《隋書》說：「父子同牀而寢」，陳侃說：「子長而有室則異居。」《隋書》說：「鬥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陳侃說：「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中國使臣)，是日而不來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神則非也。」傳聞封王日之殺人和祭神無關，更無殺人祭神之禮。《隋書》記流求王居所曰波羅檀洞，塹柵環水，樹棘為藩，其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居舍並且雕刻禽獸。但陳侃所見琉球宮室建於山巔，「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髑髏為佳之說。……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為險；殿宇樸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隋書》說，流求人「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葉枯以為年歲」；陳侃所見琉球的曆法相當進步，「豈至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據他的見聞，琉球土產無鬥鏤樹，無熊羆豺狼，但《隋書》記有。琉球土人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無《隋書》可老羊(王)、多拔茶(妻)之稱。《隋書》所記與他的見證截然不同者，他多歸之於古今之異，因為流求進化了，「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故知陳侃完全沒有在「琉球」之外尋找「流求」的意圖。

清康熙60年(1721)徐葆光出使琉球，翌年進呈《中山傳信錄》，認為「琉球見自《隋書》，其傳甚略」，謂後世記載「悞謬甚多，前人使錄已多辨之。」(卷

⁴ 陳侃，《使琉球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1534年原刊)，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1集(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4)⁵ 徐氏接受陳侃辨正舊記的《質異》，但從流求到琉球一脈相承的看法，並無異議。換言之，自明代為「流求」找到歸屬後，中國人便將《隋書》的「流求」確認作現實的「琉球」了。

日本德川早期名臣兼史家源君美（新井白石，1657-1725）撰著的琉球志書《南島志》，⁶ 作於享保己亥（1719）之〈序〉認為流求即琉球，即《隋書》倭國使臣小野妹子所說的邪久。日本文獻或寫作掖玖、夜句、益久、益救，他說：「東方古音皆通」。另外文獻有多禰嶋，「居筑紫南海中」，他認為所謂多禰國亦是流求，《唐書》作多尼，因為是日本「南海諸嶋，於後總稱之南嶋。……此間（琉球）之俗亦稱之，以為流求。」新井氏建構琉球國名自隋以下至明代的起伏過程說，「至後又名鬼嶋，則遂併流求之名而失之矣。」要等到明代，「其國稱藩中國，且通市舶於我西鄙（日本九州），流求之名復聞於此，以迨于今。」總之，他推測「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這個古名曾經消失相當長的時間，至明洪武年間太祖招諭才又傳回來。然而明人又何以知道第一次產生官方接觸的琉球即隋代的流求？而在十一年後（洪武 16 年[1383]）宗主國明帝國遂「更流求曰琉球。」⁷

《南島志》上下兩卷，分地理、世系、官職、宮室、冠服、禮刑、文藝、風俗、食貨、物產十篇；撰作體例，多在篇首引述《隋書》流求國條有關敘述，以印證他的見聞。有的加以解釋，有的歸於「古之遺俗」，如《隋書》政治體制，有王與小王，乃因國在海中洲嶼之上，壤地不接，各據以君長，遂有小大；而後世琉球語王子曰「按司」即《隋書》君長「歡斯」的古音之遺。（世系第二）琉球民間以牛馬頭骨掛門戶，即《隋書》「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的遺俗。（宮室第四）琉球方言不可解者，為古之遺言；風俗非如中世（如今琉球），亦非近世（如今中國），則為古之遺俗。（風俗第八）至若羽冠、鬥鏤樹皮製衣等今不可得考者，蓋是古制。（冠服第五）總之，新井當時所知的琉球與《隋書》流求同者，固一脈傳承；即使差異，他也歸之於古之遺言、遺俗，以此證成隋代的流求國就是後來的琉球王國。

⁵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序及卷 4。

⁶ 新井君美，《南島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甘雨亭叢書，1989），〈1719 年序〉。

⁷ 此據尚象賢撰、沖繩縣教育庁文化課編集，《重新校正中山世鑑》，〈1650 年序〉，但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則云：「明永樂中改琉球上」（卷 4）與琉球世家的著作不同，不知何據。

相較於陳侃之注目他所見琉球與《隋書》流求文化風俗之異，了解琉球更深的新井白石倒認為「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因為自隋至明將近千年，「其國沿革，復有不同。其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是很自然的。新井多次會見琉球使臣，采覽典籍，遂「據（日本）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指琉球）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序〉）總之，新井比明清的中國人更相信古「流求」即是當時的琉球。

這是明代以來中日兩國的通識，放在後來衍生的多種流求論述，當屬於「琉球說」。然而古流求的確切所在，到十九世紀七〇年代被西方學者吹皺一池春水，開始提出琉球以外的異說，除「琉球說」（或稱「沖繩說」）外，有「臺灣說」，以及包含二者的混合說，不妨稱作「臺琉說」。此後一百多年來紛紛紜紜，莫衷一是，但皆不出此三大派。明初以降琉球之名與實，學界並無異議，不會把琉球（即沖繩）和臺灣混淆，有爭議的是隋代流求之現代地理歸屬，而唐宋元三朝的流求（或琉球）是不是《隋書》的流求？這場馬拉松式的論辯係由是法國漢學家德理文侯爵（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開啟。

西元 1874 年德里文繼其師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接任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中國及韃靼、滿洲諸語和文字」講座，同年也發表“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論福爾摩沙及中文的琉球島嶼〉）。⁸ 十八世紀末法國勢力已進入安南（越南），⁹ 百年之後，法國在越南、柬埔寨的勢力已經穩固，向來研究中國文學、翻譯唐詩選集的德理文之關注東亞及東南亞的民族和歷史應該是很自然的，乃選譯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關於中國西南、中南半島和南洋諸國的條目，寫成《十三世紀馬端臨的中國外族誌》。¹⁰ 此書沒有包括《四裔考》的東方國家，而他那篇論述臺灣

⁸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6 (Août-Septembre 1874), pp. 105-121.

⁹ 且不論法國耶穌會士早在十七世紀初就到越南傳教，尤其 1787 年阮福映獲法人百多祿（Bá Da Lôc，即 Pierre Joseph Georges Pigneau）協助，與法國政府簽訂越法凡爾賽條約，割讓土地換取法國軍事支援。法政府雖未履約，百多祿仍私人助阮氏征討西山朝，十餘年後，西山朝亡，阮福映建立阮朝。參〈越南歷史〉，「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22 年 11 月 2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6%8A%E5%8D%97%E6%AD%B7%E5%8F%B2>。

¹⁰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ouvrage compose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Touan-Lin* (Genève: H. Georg, 1876).

與琉球的論文則略早，在日本進攻牡丹社、也是他擔任講座那年（1874）發表。即使他的學術地位，前不比儒蓮，後不如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但法蘭西學院講座的頭銜還是會引起視聽，而事實證明，流求論辯日後果然成為熱門的課題。

德理文批評前輩德國旅法歷史家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在其 *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亞洲歷史圖表》）否定琉球即臺灣的錯誤，據他介紹，Klaproth 把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五世紀的福爾摩沙人只籠統說成蠻狄，五至八世紀留白無說，對馬端臨關於福爾摩沙的敘述認定是琉球。德理文引述馬氏所言隋朝軍隊經過的高華嶼與龜鼈嶼屬於澎湖群島，以其只有二日、一日的航程而斷定所至流求國應該就是福爾摩沙，所以 Klaproth 指向今之琉球（沖繩）是不可接受的。德理文認為從隋代至馬端臨，流求都指福爾摩沙，以後才誤作琉球（沖繩），十七世紀後，福爾摩沙反而轉稱作雞籠山和大員。德理文顯然屬於「臺灣說」，但由於有「但書」（下詳），遂被日本學者歸入「臺琉混合說」。¹¹

十年後，德理文的流求臺灣說為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所接受，其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雖然稍後才出版，但作為臺灣第一部綜合性的歷史著作，隋煬帝攻打的流求就是臺灣遂成為西方漢學界的通說。¹²

今天看來，德理文不一定對，Klaproth 也不一定錯，德理文似乎不知《四裔考》四「琉球」條多節錄自《隋書·東夷列傳》，其定高華、龜鼈二島在澎湖作為流求臺灣說的重要基石，並無文獻學的根據，反而有反證。明嘉靖 13 年（1534）陳侃出使琉球，二十餘年後，鄭舜功出使日本，途經琉球，所著《日本一鑑·浮海圖經》（抄本）羅列航線所經島嶼，¹³ 其中哪霸港和大琉球國之後有龜鼈嶼、

¹¹ 秋山謙藏歸納東西方學界的兩種假說，一說隋代流求是包含臺灣和琉球的總稱，另一說謂元代以前只限於今之臺灣，明初才把此名遷到今之琉球。前說 d'Hervey de Saint-Denys（德理文）始倡，後說是 Gustave Schlegel（施古德），其實他全弄錯了。參秋山謙藏，〈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関する第二論〉，《歷史地理》（東京）58:6（1931 年 12 月），頁 511-524。

¹² 參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原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 15-16；戴麗娟，〈導讀〉，收於于雅樂原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頁 xx-xxii。

¹³ 鄭舜功，《日本一鑑·浮海圖經》，民國 28 年（1939）據舊鈔本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華山。(卷2)航海針路的「山」即是島,「華山」一名可能有誤字或漏字。琉球本島附近的這兩個島嶼,《大明一統志》卷89〈外夷〉「琉球國」作鼉鼉嶼、高華嶼,分別注云:在國西,水行一日,水行三日;至於澎湖島,注云:「在國西水行五日。」如果《大明一統志》和鄭舜功一樣有田野訪查根據,那麼流求臺灣說的方位證據便相對薄弱,澎湖到臺灣之間的水程肯定不用五天。

認同德理文之說的荷蘭漢學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在論琉球國地理與民族諸問題一文把《一統志》這些文字串在一起,安排這三個島嶼的相對位置,加注鼉鼉嶼在澎湖之北,高華嶼在澎湖之南,又增加「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朗,望之隱然若煙霧中」的敘述,¹⁴以便從地理方位證成他的臺灣說。這些地理安排都沒有權威的文獻學根據,而且和明代人的說法完全相悖。

施古德雖繼承德理文的觀點,但他更側重民族文化的論說,譯述《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的民族誌,分別就宮室(les demeures royales)、鬥鏤樹、行政(gouvernement)、穿著裝飾、兵器、戰爭、科學與宗教、外貌與風俗習慣和喪葬、鹽酢酒以及野獸家畜等方面和近代歐洲人到福爾摩沙的見聞互相印證。他接著概述元代以前中國歷代流求(或琉球)資料,以及明清的中琉關係,最後堅定自信地下結論說:以前中國人將琉球(沖繩)與福爾摩沙合而為一,造成東西方學者的混亂,此文一出當可以廓清。¹⁵爾後西方漢學家接受流求臺灣說者,則有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和洛克希勒(W. W. Rockhill, 1854-1914)合著的*Chau Ju-Kua*,二氏譯注南宋趙汝适(1170-1228)《諸蕃志》(1225年序),卷上〈志國〉流求國條注一開宗明義就說:「無疑的,這個名叫流求的國家是福爾摩沙,我們的作者(指趙汝适)相當明確地意指這個結論。」¹⁶接著簡述德理文與

¹⁴ Gustave Schlegel,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 《通報》*T'oung Pao* (Leiden, E. J. Brill) VI (1895), pp. 173-174; 收於希格勒(Gustave Schlegel, 施古德)撰、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卷19〈古琉球國考證〉,頁166-167。

¹⁵ Il suffit que nous ayons démontré que les anciens Chinois ont confondu les îles *Lieou-kieou* avec l'île de Formose, et que c'est par suite de cette confusion que les savants chinois et européens ont été dérouterés.

¹⁶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 1911), pp. 163-164.

施古德之說，沒有申論。

然而元代以前，中國文獻的「流求」或「琉球」從無人明確認定是臺灣，也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推論是臺灣，但臺灣說卻為近代多數日本和中國學者所接受。不止隋代的流求，甚至更早的夷州，日本老輩學者市村瓚次郎都指為臺灣，¹⁷以東西交通史聞名的藤田豐八（1869-1929）校注《島夷誌略》、以《臺灣文化誌》傳世的伊能嘉矩（1867-1925），以及東洋史學者白鳥庫吉（1865-1942）和曾我部靜雄（1901-1991），都屬於臺灣說，¹⁸而日本這派最具代表的學者恐怕非和田清（1890-1963）莫屬。¹⁹和田氏的討論少作細目考證，而著眼於外貿大勢，引《諸蕃志》流求國「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卷上）與《元史》瑠求「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外國列傳〉）認定流求對外關係之封閉；但明初琉球國的貢物有蘇木、胡椒等南洋特產，以證成那個封閉的「流求」不是琉球（沖繩）。另外地理方位的推斷，他用的日本文獻，如琉球北部入貢諸島和南端島嶼的名稱，以及弘法大師《性靈集》、三善清行《智澄大師傳》（下詳），對臺灣說也是比較有說服性的。至於「琉球」並非當地人自稱，而是明皇帝所定，太祖時尚無後來的琉球王國，主要的中山王為便於與明交流，不得已接受此蠻域國王之名，致使偽琉球（今沖繩）忽而有名，真琉球的臺灣反而蔭蔽不彰。他這樣說算不算相當的辯證？

至於臺灣方面，上世紀五〇年代郭廷以講的臺灣史，關於漢、吳、晉的夷州和亶州，他都無異議地認作臺灣，自隋至元定為臺灣史的「琉求時代」。他說流求是 Rokan 之譯音，乃原住民所稱的鹿港，隋遠征軍登陸之地。²⁰兼治臺灣史的中西交通史家方豪，其遺著《臺灣早期史綱》詮釋史料基本上也確定是臺灣，只因中外學者意見不一致，遂抱存疑的審慎態度。²¹而熟悉日本學術傳統的曹永和

¹⁷ 市村瓚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東洋學報》（東京）8: 1（1918年1月），頁1-25。

¹⁸ 參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注》（北平：文殿閣書莊，1936），頁4-6；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4），卷上，頁12-26；白鳥庫吉，〈夷洲及び亶洲に就いて〉，《史學雜誌》（東京）41: 12（1930年12月），頁24-48，「第一百十六回東洋史談話會記事」；白鳥庫吉，〈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民族學研究》（東京）1: 4（1935年10月），頁595-618；曾我部靜雄，〈所謂隋代流求に就ての異聞二つ〉，《歴史と地理》（東京）29: 1（1932年2月），頁70-74。

¹⁹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東洋學報》14: 4（1924年12月），頁558-581；和田清，〈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ついて〉，《歴史地理》57: 3（1931年3月），頁1-34。

²⁰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1954），頁4。

²¹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13-26。

(1920-2014)，在六〇年代探討臺灣早期開發，據《隋書》所載流求人習俗與《臨海水土志》所記的夷州頗多吻合，亦可與今日臺灣土著民族古習俗相印證，而且當時臺灣正如《隋書》所云，產無奇貨，未有海外貿易。故曹氏對日本學界長期論辯的流求問題，認同明代之前的流求（琉球）即臺灣。²² 不過二十五年以後，他的觀點有所修正，商賈通者指今日琉球（沖繩），不通者是今日臺灣。這是說中國文獻有兩種流求（琉球）的混淆存在，²³ 但不屬於包含臺灣和沖繩的混合說。然而此論亦難確定《隋書》流求必指商賈不通的臺灣，因為六、七世紀時沖繩的經濟依然原始。另外如陳漢光和盛清沂等早期臺灣史研究者，根據唐宋元的流求文獻，皆不同程度地傾向臺灣說。²⁴

將琉球（沖繩）和臺灣統合在古流求（琉球）之下的「混合說」應該也來自德理文，德理文批評 Klaproth 錯誤地認為中國人最早稱臺灣蠻夷，五至七世紀無所指；不過隋軍遠征探險後至十三世紀馬端臨，可以確定臺灣稱作琉球，至明代用來稱沖繩。到十六世紀中國人把福爾摩沙當作大琉球（沖繩）的附件。他認為倭國使臣小野妹子所謂的「夷邪久」（日語 Riou-kiou，中語 Lieou-kieou）是指介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島嶼，於是中文的「琉球」（流求）遂成為可以延伸到靠近日本的集合名稱。他特別提醒這是引起我們錯誤的根源，後來學界把這個臺灣說者當作臺琉混合說的創始人，也就是把他的「但書」當作正論。其實最早積極論述「流求」包含琉球與臺灣者，當推旅日德國歷史家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西元 1897 年發表的 *Geschichte Formosa*（《臺灣島史》）。

里斯的臺灣史首揭馬來族群和琉球名稱，認為：「中國人很古時候已經知道在臺灣那邊向日本方面去，還有一列島嶼，他們把它們包括在『琉球』（流求）的名稱中。」他為批判臺灣說的施古德，過度解釋德理文之混同緣由，引為同道說：「如同德理文之所證明，那一次遠征的目標只是臺灣的海岸，然而那個日本人（指倭國使臣）卻能識別那種民族的武器，是從距臺灣 100 公里、在日本之南

²²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臺北）3（1963年4月），頁1-51；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4-5。

²³ 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收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88），第3輯，頁283-312；收於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98-204。

²⁴ 陳漢光，〈唐宋時代的流求文獻〉，《臺灣文獻》（南投）21:4（1970年12月），頁13-16；盛清沂，〈宋元臺灣史事考〉，《新時代》（臺北）15:7（1975年7月），頁3-7。

的群島中之一島携回的戰利品。」²⁵ 里斯肯定倭國使臣的認定，因而推斷：「中國人以為他們到過的那個島，是在日本人所到達過的島界的北部邊境」，相信臺灣及遙遠琉球列島為同一人種所居住。里斯說，中國人的「琉球」包括至少距臺灣 70 海哩的琉球列島，他據十七世紀荷蘭人記錄的瑯嶠人，斷定是保有特別文化的古流求人，因而認為「臺灣北部和西部，在古代完全為從琉球群島而來的人種所移住」，荷蘭人在窮困的瑯嶠還可看到的高山種族是其殘餘者。

受聘於東京大學的里斯，是日本史學現代化的推手，對日本學界產生很大影響力，日本殖民臺灣第三年發表了《臺灣島史》，應有相當的權威性，寫作《臺灣志》（1902）時的伊能嘉矩即信從其說。伊能說臺灣地勢連同沖繩列島成一條長帶，或斷或續，有如水中躍石，故被視為同一群島，於是概括稱作「琉球」，引明代陳仁錫《世法錄》「蜿蜒若虬浮水中」立說，²⁶ 單憑水中游龍這種想像實不足以建構臺琉混合說。

混合說處於琉球、臺灣兩說之間，雖曰兼美，實亦兩傷。臺北帝國大學首任總長幣原坦（1870-1953），專門研究朝鮮、琉球和臺灣歷史。早先他的《南島沿革史論》（1898）主張流求沖繩說，三十多年後在里斯的基礎上轉為臺琉混合說，²⁷ 最可見其論證和思辨的歷程，可謂煞費苦心。關於流求所在，他發現《元史·外國列傳》瑠求條曰：「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所以說流求（琉球）是臺灣當比沖繩妥當。這時流求論辯在日本已極熱烈，經過秋山謙藏琉球說（1929，下詳）對和田清臺灣說（1924）的質疑，²⁸ 看到喜田貞吉「文獻上琉球七分，臺灣三分」，²⁹ 還有伊波普猷從「風俗上沖繩八分，臺灣二分」，轉而提出隋人第一次到的是臺灣、第二次才是沖繩的折衷，³⁰ 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幣原氏勢必非尋求一個滿意的

²⁵ Ludwig Riess, "Geschichte Formosa," *Mitt. der Deutschen Ges. Tokyo* (1897), 中譯版: Ludwig Riess 著、周學普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島史》(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研究叢刊第 34 種,1956), 頁 1-36。

²⁶ 伊能嘉矩,《臺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據日本明治 35 年[1902]排印本影印), 頁 2。

²⁷ 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爭の批判〉,《南方土俗》(臺北) 1: 3 (1931 年 11 月), 頁 1-20, 後收於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 第四章。

²⁸ 秋山謙藏,〈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歷史地理》54: 2 (1929 年 8 月), 頁 93-126。

²⁹ 喜田貞吉,〈隋書の流求傳に就いて〉,《歷史地理》54: 3 (1929 年 9 月), 頁 197-198。

³⁰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史》(東京:春陽堂,1926); 伊波普猷,〈隋書に現れたる琉球〉,《沖繩教育》(那霸) 157/158 (1926 年), 收於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 第二卷》(東京:平凡社,1974), 頁 506。

解釋不可，遂發展出臺琉混合說。³¹

幣原坦認為《隋書》云流求「水行五日而至」，有熊羆、無牛羊都適用於臺灣，但其頗具階層的政治組織以及烏了帥的官職，臺灣原住民沒有這麼複雜，沖繩說才比較妥當。流求政治文化雖然頗高，卻又有王宮聚鬪體的蠻風，文野並存，他乃採里斯流求遺裔瑯嶠族來彌縫。論證上除援引十七世紀荷蘭人的記載外，他又引用十九世紀初船長文助漂流到秀姑巒溪大港口的經歷，所見瑯嶠人比當地原住民文明進化，³² 以及他自己到恒春對瑯嶠人的直接觀察，遂申張琉球人移民到南臺灣之說，而附合和田清提出隋遠征軍到的地方是臺灣。如此的臺琉混合說誠然比里斯細緻，但未免太過曲折了吧！

第三種說法是《隋書》流求和其後同音的相關資料都指今沖繩的琉球，不包括臺灣，即所謂的「琉球說」。此論回到明清以及日本德川幕府時代中、日兩國史學的通識，傳統的琉球說已如前節所述；至於近現代首推中馬庚，爾後秋山謙藏主張最力。在荷蘭施古德流求臺灣說發表的第二年，中馬庚首揭琉球說予以反駁，他從風俗文化與方位里程分別論述隋軍攻掠的流求就是明代以後所知道的琉球，今之沖繩。³³ 風俗文化方面，參考《南島志》與《沖繩志》，中馬氏認為流求的政治組織非臺灣原民所可能有，其織物歸於琉球比臺灣適當。賦稅、刑罰、文字、石刃農具、以指取食、踢足而歌、與分娩後以火自炙等項目，為琉球與臺灣所共同，但歷史因素會造成改變，健勇、好鬥及食人之風，琉球因為自推古天皇（592-628）以後交通日本而趨於文弱，臺灣則古風猶存。君臣父子之禮的轉變也類似。諸如此類，可以斷言「隋時的琉球（當寫作「流求」）乃今之臺灣。」然而《隋書》說流求男子拔除髭鬚與體毛，符合臺灣原住民而與琉球人之蓄髯多毛不同，但他說琉球人留鬚蓄髯只限於上流人士，下層民眾亦皆剃鬚。流求只有一點他認為適合臺灣，「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集食之。」中馬庚竟把獵首族當作食人族！總之，《隋書》流求之風俗文化近於琉球，臺灣或也兼有之，

³¹ 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爭の批判〉，頁 1-20。

³² 參蔡美倩主編，蔡錦堂、鍾淑敏編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ヨプラン島之記：愛書覆刻本〉（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1）。

³³ 中馬庚，〈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史學雜誌》8: 11（1897年11月），頁 1066-1093；8: 12（1897年12月），頁 1187-1205。

至於對琉球說很棘手的崑崙人，他曲折地解釋，講馬來語的崑崙人是到琉球販賣薄熊皮和豹皮，以供製作衣甲，以琉球語溝通，因而論證琉球說。

另一論辯大課題是方位里程。流求在建安郡（福州）東方，中馬氏根據琉球著名儒學者程順則（1663-1735）的《指南廣義》所述，福州往琉球的航行針路，出五虎門開洋用單卯針，至彭家山（嶼）用乙卯并單卯針，取釣魚臺用單卯針，取黃尾嶼用甲寅針，取赤尾嶼用乙卯針，取姑米山用單卯針，取馬齒用甲卯及甲寅針，然後入那霸港。據羅盤二十四方位，單卯針是 90°（正東），乙卯針 90-105°，甲寅針 60-75°，甲卯針 75-90°。從福州航往沖繩本島主要方向是正東或東偏北，可見「當建安郡東」的流求國應該是琉球，而不是在福州東南的臺灣。至於隋軍從潮州義安出發，途經高華、龜鼈二嶼而至流求，《隋書·東夷列傳》只提供高華嶼至龜鼈嶼，再到流求的水程，分別為二日及一日，中馬庚設定高華嶼值臺灣，龜鼈嶼即明人所稱琉球國的葉壁山，符合順風時到達琉球國的日程。

《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經過中馬庚的分析，就風俗文化上說，琉球比臺灣更適合；而地理方位上，則斷然是琉球無疑。他的結論，隋人所至乃真琉球，元初誤作臺灣，至明初而知認識謬誤，乃稱臺灣為小琉球。從學術史看，中馬庚繼承傳統的琉球說，增強新井白石風俗文化的考證，納入陳侃歷史發展的古今之異，可謂近現代流求論辯主張琉球說的始倡人。

中馬庚之後三十餘年，秋山謙藏（1903-1978）再申其說，研究方法仍然遵循風俗文化與方位里程兩條路徑。³⁴ 他闡述《隋書》的部分，婆羅檀洞，引《元史·仁宗紀》「海外波羅公之民」和萬曆《溫州府志》的「海外婆羅公管下密牙古人民」，確定密牙古即宮古（みやく）島。過去無解的鬥鏤樹，他說即琉球群生的榕樹。政治組織的烏了帥與龜鼈嶼皆採用伊波普猷之說，即頭人和久米島。不過他更多採取歷史發展的觀點，說明後代琉球記載與《隋書》不同之處係文明進化之故，如好勇鬥狠、不解文字、食皆用手、熊羆豺狼、祀神之禮、累聚鬪體與門戶裝飾獸頭骨角等。雖然社會進步，風俗改變，但《朝鮮實錄》所記琉球使人答問，仍然還殘留一些隋代遺風。

秋山氏成為堅決的琉球說者，不但反對臺灣說，也反對琉球臺灣混合說。他

³⁴ 秋山謙藏，〈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頁 98-119。

的論說獲得喜田貞吉的附和，³⁵ 法國的日本史學家阿格諾赫（M. C. Haguenaer）斷然反對和田清的論點，質疑臺灣說；³⁶ 也從民俗學支持秋山的琉球說，阿格諾赫頂多讓步到十五世紀以前的「流求」比十五世紀以後具有遠為廣泛的義涵而已，³⁷ 勉強屬於混合說。

琉球學之父伊波普猷（1876-1947）謂《隋書》所記流求風俗文化，見於琉球或臺灣者，八二開，但他說臺灣那二分琉球也有份，可見他是琉球說的堅決派。上文說過伊波普猷提出以隋軍先後兩次所到之地不同而想解決臺灣與沖繩的難題，但他旋即不滿自己的調和論，乃從地理、日程、語言、土俗等全面論述古流求即琉球（沖繩）。他通過《隋書》流求的探索，由古代閩越與馬來族的接觸，馬來族和日本民族的交涉，一窺日本民族和閩越的關係，以為解答日本學界謎團之一關鍵，至於隱藏的臺灣島則在朦朧之中，不可確知。³⁸

戰後日本學界對流求的興趣依然不減，到千禧世紀之交，轉而出現新的琉球說者，如中村明藏把《隋書》流求傳當作沖繩史記，六世紀以來活潑的交易活動形成小國地域，從而共立聯合王國，於是有儀仗排場和刀劍武器。諸多社會禮俗，如婦人黥手、分娩火灸、宴飲歌舞，以及釀酒和身體裝飾，他都從琉球的歷史記載和習俗記事得到印證。³⁹ 但同屬琉球說的新一代，有的人並非毫無保留，如山里純一出版的古代南島專著，考證日本文獻的掖玖與《隋書》的流求即是一例。⁴⁰ 他審慎地傾向於七世紀初流求臺灣說恐怕比沖繩說不至於太乖離，但卻又認為《隋書》流求傳的史料價值無法完全否定沖繩說，甚至可以追溯到六世紀南島（指琉球）存在的身分階層。他的游移態度顯見一百多年來臺灣與琉球的糾葛尚未結束。

³⁵ 喜田貞吉，〈隋書の流求傳に就いて〉，頁 197-198。

³⁶ M. C. Haguenaer, "I. Le Lieou-k'ieou kauo du Sonei chou était-il Formose?" *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Paris) Série Française, Tome II, No. 3/4 (1930). 此文日譯作〈隋書の流求は臺灣なりしや〉，參秋山謙藏，〈流求即臺灣說再批判：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三論〉，《歷史地理》59: 1 (1932年1月)，頁 37-71。

³⁷ アグノエル〔按：即 M. C. Haguenaer〕，〈隋書の流求を臺灣に比定せんとする一試案に対する批判〉，《歷史地理》58: 5 (1931年11月)，頁 86-88。

³⁸ 伊波普猷，〈隋書の流求に就いての疑問〉，《東洋學報》16: 2 (1927年6月)，頁 246-280，收於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頁 525-555。

³⁹ 中村明藏，〈古代の沖繩と《隋書》流求伝：六～七世紀、沖繩史への接近〉，收於鹿兒島國際大學附置地域総合研究所編，〈沖繩對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4），頁 134-136。

⁴⁰ 山里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頁 6-21。

中國或臺灣的學者對於長久喧騰於日本史學界的「流求」論辯多沉默無語，除上舉臺灣說諸賢外，只有留學日本、戰後來臺任教於東海大學的梁嘉彬（1910-1995）主張琉球說。梁氏自上世紀四〇年代〈流求史論正謬〉（1947）以後，發表一系列論述，⁴¹ 畢生精力盡瘁於斯，凡此長年研究成果，最後七〇年代匯集於〈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中（1972）。梁嘉彬這些論述對法國德理文、荷蘭施古德、德國里斯以及日本市村瓚次郎、和田清、幣原坦等的流求臺灣說或臺琉混合說，皆有所批判。他將所糾舉的臺灣說依據而歸屬於琉球，追究其方法論，也是學界行之多年的民族文化和方位里程的考證；但涉及土地農業、動植物、衣著服飾、人種族性諸方面的具體內容，並沒有特別新方法。總結而言，梁氏主張《臨海水土志》的夷州和《隋書·東夷列傳》的流求都不合臺灣，但合於琉球。

三、既真實又縹緲的流求國

流求所在的三說，都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法、荷、德三國學者，而在日本發酵。三派爭辯不休，不但有隔代批判，有同時對壘，即使同一人而轉變陣營者亦非罕見。論辯對壘譬如伊波普猷之於東恩納寬惇，秋山謙藏之於和田清，前者琉球說，後者臺灣說；而伊能嘉矩從混合說轉為臺灣說，幣原坦則從琉球說改成混合說。如此複雜情況，每位論者多有他們的學術根據，不是單純地因現實政治考慮而已。

三說的成因，追根究柢還是肇始於本文開篇所論中國傳統對東方海面的了解太過模糊，故載記粗略，又零碎殘闕。然而學術討論只有回歸基本史料，才能清理出比較合理的頭緒。

中國傳統關於「流求」及其同音異寫的「琉球」、「瑠求」等文獻，半世紀前經由吳幅員、曹永和二氏蒐羅彙集成《流求與鷄籠山》一書，收入「臺灣文獻叢刊」，扣除年代甚晚的《新元史》，總計 36 種。「流求國」記事始於唐修《隋書·東夷列傳》、《北史》，宋代《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以及鄭樵（1104-1162）

⁴¹ 參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1965），尤其第二部「琉球史地叢考及其與中國關係之論證」。梁氏後有續作，見〈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大陸雜誌》（臺北）45: 6（1972年12月），頁1-38，及〈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考證：兼考宋前宋後琉球及臺灣澎湖諸島〉，《大陸雜誌》44: 1（1972年1月），頁1-32。

《通志》與元修《宋史》，大抵多沿襲《隋書》的資訊。南宋趙汝适《諸蕃志》增益所謂鄰近的毗舍耶和三嶼兩個地方，《宋史》「流求國」條詳於毗舍耶，反而略於流求。另一種寫法的「琉球」，一般通行於明清近代，但早在杜佑（735-812）的《通典》就出現過，寫法雖異於《隋書》，唯其內容則相同。這些唐宋時期資訊來源相當單一，大抵抄自有具體事蹟的《隋書》，倒是這時一些私人的相關著述，別有見聞，⁴² 反映當時對「流求」的認識或想像已經明顯有文明與野蠻的分歧。自隋以後，不論官方或民間所說的流求，都沒有經過實地考察，到元代，官方才有瑠求的實際經驗，民間也有人到過「琉球」，但這些都不如明代使節來往紀錄之確實可靠。

明代以後的「琉球」和以前的「流求」，語音雖近，但它們的政治、社會、文化面貌則有文明與野蠻之截然差別。明清的出使報告，其真確性固不待言，一般記述多本於可靠的資料，有足夠的知識敢批評「前史多不足信」，如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1520年序）、茅元儀的《武備志》（1621年序），都指出《大明一統志》載琉球「非實事」。但明太祖第一次遣使琉球（1372）後歷經九十年史臣進呈的《一統志》（1461），竟然還把《隋書》流求的風俗文化摻入當時的琉球王國，而晚到十七世紀三〇年代陳仁錫刻成的《潛確居類書》也不能免，可見古流求和當代琉球是一是二的混淆和困擾，長久以來就存在。直到清初的《明史稿》（1723）和《明史》（1739）才廓清，不過同時編纂的《續文獻通考》卻仍被馬端臨所糾纏。

歷史研究方法以甄別史料為基石，甄別原則是直接史料的價值高於間接史料。親履其地，親睹其事，親聞其言者才算直接史料，上述諸書的流求記事大概只有《隋書》流求國傳根據直接史料（國家檔案），遂成為後來相關著述的母本。

開啟近代流求爭辯的德理文，他的流求論述係根據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四裔考》「琉球條」，換言之，馬氏是近代論辯的源頭。馬端臨除把唐宋記載的「建安郡之東」改為「泉州之東」外，又拉當時已經知道的澎湖來定位，但內容則完全沿用《隋書》的「流求國」，似乎元之琉球即是隋之流求。不過把

⁴² 參黃寬重，〈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57: 3（1986年9月），頁501-510。

建安（福州）改為泉州，並沒有實證依據，稍後的汪大淵（約 1308-?）《島夷誌略》（或稱《島夷志》，1349）才有實地考察經驗，他的琉球記述則與馬端臨的琉球（亦即隋之流求）不同。

生長於國際港都泉州的汪大淵，吳鑒為《島夷志》作的〈序〉，說他「少負奇氣，為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大淵自己的〈後序〉也說：「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域，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可見《島夷誌略》的內容多得自親身見聞，而把琉球置於海外諸國之始，開篇說：

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峙（崎）。其峙（大崎）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暘谷之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⁴³

這四座山名是音譯還是意譯，或者兼而有之？看日出的大峙山距離澎湖甚近，顯然不是沖繩，但主琉球說的新井白石則以為翠麗即今首里，重曼蓋謂石垣，皆在沖繩。⁴⁴ 屬於臺灣說的藤田豐八推測斧頭即虎頭，在今安平附近，大崎山即打狗，重曼疑沙馬之異字，即沙馬機頭。⁴⁵ 汪大淵顯然登上「琉球」，不比馬端臨只坐在書房抄史料，中國文獻涉及流求或琉球，自唐到元，親履其地者恐怕只有他一人而已。至於這個琉球在今天哪裡？《島夷志略》既然說「自澎湖望之甚近」，臺灣應該比琉球合理，但是否確定是臺灣，文本仍然看不出來。《志略》記載琉球的文化現象和十七世紀臺灣平埔族的情形仍難吻合。

⁴³ 汪大淵，《島夷誌略》（臺北：學生書局，影印光緒 18 年[1892]順德龍氏知服齋刊本，1975；1350 年原刊），頁 1，「琉球」；大峙，藤田豐八校注云：其殆大崎之誤，峙當作崎。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注》，頁 3-5。

⁴⁴ 屬於琉球說的新井白石，其《南島志》卷 1「地理」考證音轉云：「沖繩島，即中山國也，……王府在西南，曰首里，蓋古翠麗山地，今作首里，方音之轉也。（注：翠麗山，見《星槎勝覽》。按即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後集，頁 8。）」又云：「八重山島，石垣、入表二島之地，總稱以為八重山，國史稱信覺。」（注：見《續日本書紀》），《星槎勝覽》稱重曼山，蓋皆謂此石垣，乃是信覺之轉耳。」新井氏以為翠麗（疑當作翠麓）即首里，重曼（石垣）即信覺，皆沖繩之地。

⁴⁵ 藤田豐八校注，《島夷志略校注》，頁 4-5。

明朝初期因為開始與中山國（今之沖繩）建立邦交，卻稱他們「琉球國」，琉球的記事於是明確，不過當時的費信（1388-？）雖然也是航海家，四次下西洋，沒到過東洋，所著《星槎勝覽》（1436）後集的「琉球國」便採輯《島夷誌略》，並且加上一些捕風捉影的傳聞，茅元儀批評他有所妄傳。⁴⁶ 文獻可考者，明朝以前中國官方到過流求或瑠求的，只隋、元兩朝，隋有三次，元有兩次，其他的紀錄都是輾轉抄襲，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明洪武5年（1372）遣使招諭入貢的琉球國，當時分中山、山南、山北三國，尚未統一，可能有相當的衣冠文明。據洪武23年（1390）使節團通事私帶的乳香、胡椒來看，⁴⁷ 故知琉球與南洋早有貿易，不是和中國往來後才「夷習稍變」。（《武備志·占度載》琉球條）當然，一旦與中國建立邦交，貴遊子弟留學中國，快速華化，和《隋書》以下流求國的原始社會情狀截然不同。然而明代關於琉球的記載，官書如《大明一統志·外夷》，民書如《潛確居類書·區宇部·東南夷》多將前此史書所記的流求國坐實於接受冊封之琉球國。《武備志·占度載》亦視明代琉球為隋之流求，而其文化描述則採擷使臣的報告；《西洋朝貢典錄》還摻入《島夷誌略》及《星槎勝覽》增益的部分。

晚到清初康熙年間，史臣編纂《明史稿》，截斷眾流，琉球歷史只上溯到元代，宋朝以前種種「流求」或「琉球」的記載都割捨不論；另外取材於《東西洋考》〈東洋列國考〉的「鷄籠 淡水」條，在其〈外國列傳〉置「鷄籠山」一條，講的卻是臺灣史。琉球和臺灣不再混淆，為乾隆初定稿的《明史》所繼承。明清當時看到的琉球國暫且不論，至於史書傳述縹緲的流求國，我們不妨從後世多種剪接拷貝帶所根據的母帶《隋書》檢查起。

《隋書》記錄「流求」有三處，主要在卷81〈東夷列傳〉，其次是卷64〈陳稜列傳〉，最簡略的是卷3〈煬帝紀上〉。隋帝國之與流求國產生瓜葛，據〈東夷列傳〉「流求國」，起因於大業3年（607），好大喜功的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當時水師有一位名叫何蠻的人，知道海上有一個國家，

⁴⁶ 《島夷誌略》「以花布為衫」到《星槎勝覽》則增益為「以花印布大袖衫連褲穿之」，平添許多沒有憑據的文化成分，而費氏又謂其人「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恐怕多是想像的吧。

⁴⁷ 《明史稿》卷197〈外國四〉「琉球」條云：「二十三年中山來貢，其通事私攜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為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

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

朝廷既有入海宣揚國威的政策，是他出頭的機會，何蠻乃大膽地把平昔所「見」向朱寬報告了。隋帝國的海岸線幾乎等同今日中國，何蠻這個水師駐紮何處，史書無說，東望依稀所見之島是哪個島，便無從推斷。不過《隋書》說，朱寬「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茫茫大海，如何到法，歷時多久，史書都沒有交待，只說言語不通，於是「掠一人而返」。

勞師動眾，不知航行多少里程，竟然只劫掠一個俘虜就回來了！不過唐人張鷟（658-730）《朝野僉載》的記載和官修正史不同，他說「煬帝令朱寬征留仇〔註：即後流虬〕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⁴⁸ 獲千餘口有可能與稍後陳稜的故事相混淆，無論如何當掠比一人合理，並且還掠奪了流求國的特產，有細白的木皮布，和色如真金、文如美錦、嗅賽沉檀香的金荊榴木。

第二年（608）再派朱寬帶兵去安撫流求國人，流求真倔強，硬是不從，於是「寬取其布甲而還。」可能因為皇上交待「慰撫之」，朱寬不敢再無端綁架或劫掠流求人了，這次只帶回「布甲」呈獻給皇帝，證明他的確到了目的地。布甲當是胸甲之類的東西，適逢「倭國使臣來朝」，隋煬帝讓倭使鑑定，回報說：「此夷邪久國人所用品也。」這位倭使據日本史記是小野妹子。⁴⁹

倭國在今日本九州，其君自稱是「日出處天子」，而稱隋帝為「日沒處天子」，⁵⁰ 隋倭平等外交，說倭使「來朝」，當然是中國史臣給自己臉上貼金，這是題外話，按不下表。不過倭國使臣倒提供一點新知識，朱寬去的「流求」，其人穿戴的胸甲是夷邪久人用的衣物，流求即使不是夷邪久，兩國當具有密切的關係。根據幣原坦的研究，夷邪久即沖繩群島的屋久島，但伊能嘉矩則以為是南島的總稱。⁵¹

⁴⁸ 李昉，《太平廣記》卷 482〈蠻夷類三〉留仇國條引《朝野僉載》。此國「緝木皮為布，甚細白，……亦有細斑布。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彩盤旋，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為枕及素面，雖沉檀不能及。」李昉，《太平廣記》（臺北：新興書局，1958），第 10 冊，頁 3623。

⁴⁹ 伊波普猷據伊地知季安之《南聘紀考》（天保年間，1830-1844），考知小野妹子於推古天皇 15 年（607）使隋，同 17 年（609）歸朝，故得見朱寬携回長安之布甲。參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頁 506。

⁵⁰ 《隋書·東夷列傳》倭國條：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

⁵¹ 夷邪久（イヤク），《日本書紀》作「掖久（ヤク）」，《大日本地名辭書》曰：「掖久寫作夷耶（邪）久，因為ヤ的發音含有イ之故。」《日本書紀》天武天皇紀白鳳 11 年（683）7 月：「多禰（タネ）人、

再過兩年，大業6年（610），隋煬帝第三次派兵進入流求國。這次可不同，大兵壓境，真打起來。原因史書仍然空白，至少我們可以確認，遙遠的流求國既不可能侵略中國，也沒有來由得罪煬帝，但大隋皇帝說打就打。武賁郎將陳稜任統帥，朝請大夫張鎮州輔佐，〈東夷列傳〉云：「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陳稜列傳〉云：稜與「張鎮周（州）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隋朝的義安當今廣東潮州，自潮汕一帶出發，往哪個方向去，史書缺載，航行一個多月經過的地方亦未記載。東陽在今浙江金華，萬餘人是一支龐大的軍隊，糧草補給不易，既然三、四年前兩度到過流求，不論流求是臺灣或沖繩，東陽兵儘可以從浙江、福建的港口出海，何必跋千山、涉萬水到潮州，再從汕頭出海攻打臺灣或沖繩？既不合理，也不可解。

《隋書》的記述令人懷疑陳稜的軍隊會不會航行到臺灣和沖繩之外的第三地？除徵兵之地、出航港口和目的地三者之間不合理外，時間與航行節令也有矛盾。《隋書·煬帝紀上》記陳稜、張鎮州擊破流求的日期是二月乙巳，前推航行一個多月，應該在去年底或翌年正月出發，正是冬季，吹東北季風，帆船時代隋的水師不可能逆風而航，所以過去有人便把這日子作為凱旋，出師則在前一年。即使這樣還是兜不攏，因為自陰曆九月就開始刮東北風了，臺灣地方誌多謂「九月北風初烈」，陳稜萬餘雄師如何在海上航行這麼久？如果要認定正月出航，往南才順風，那麼目的地非更在南邊不可。〈東夷列傳〉還說：「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其徵調中南半島的人去打沖繩或者臺灣，也不太合理。最後上引《太平廣記》所錄《朝野僉載》如果可信，至少比《隋書》記第一次攻打流求國合理，這條記載說：

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為解脫之。

隋代的南海郡治在今廣州，朱寬班師回朝，目的地去揚州向煬帝報告，豈有從今之沖繩或臺灣南下廣州，再北上揚州之理？這麼說，隋代的流求國在南海中乎？

掖久人、阿麻彌（アマミ）人，賜祿各有差。」幣原坦云，「多彌即今種子島，掖久、屋久島，阿麻彌、大島。」見幣原坦，《南島沿革史論》（東京：富山房，1900），頁9。伊能嘉矩說見《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頁14。

因為缺乏正面的資料，我不可能另外提出假說，也不願在這個已夠紛擾的老問題再增加混亂。其實過去的流求論述如果有足夠強力證據，問題恐怕早已解決了。

回歸正史文獻。關於隋師航行路線，〈東夷列傳〉只記隋軍最後幾天的里程，

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

隋朝的高華嶼、龜鼈嶼在哪裡？當代地誌史籍皆無線索可尋，近現代學者擬定的地點，北至沖繩，南到閩粵交界的南澳島，天差地別，全為呼應一己之說而定流求所在，沒有確實根據。臺灣史研究典範人物伊能嘉矩承襲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注》之說，以為高華嶼是近於澎湖西南的大嶼或西北的花嶼，龜鼈嶼即澎湖東北的奎壁嶼；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淮南江表諸郡」也依此說標示。⁵² 伊能氏是臺灣說者，但如果流求是臺灣，澎湖群島的奎壁和花嶼之間要兩日航程，花嶼至臺灣卻只一日，如何理解？同屬臺灣論的和田清遂將高華嶼安置在閩粵交界的南澳島，龜鼈嶼放在澎湖，流求指認在臺南平原。⁵³ 另一方面的琉球說者，新井白石《南島志》卷上說高華嶼在今臺灣，龜（原作鼈）鼈嶼即沖繩的惠平屋島；上文已述同屬琉球說的伊波普猷以龜鼈嶼即沖繩的久米島，而梁嘉彬則分別認定為基隆外海的彭佳嶼和那霸港外的久米島。⁵⁴ 可見《隋書》的高華、龜鼈和流求都缺乏可以確證的基準點，即使有二日、一日的航行日數，也派不上用場；至於〈陳稜列傳〉「月餘而至」這句話，論者多視而不見，從潮汕到臺灣或沖繩，除非遭風漂流，何需一個多月？

雖然軍行方向不明、路程矛盾，攻打流求國的兵源可能也有問題，不過，《隋書》的流求記事似非憑空想像，應當有官方檔案做依據，只是戰報虛實不能令人無疑。〈陳稜列傳〉和〈東夷列傳〉都說俘虜男女數千人，〈煬帝紀〉則說：「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戰報不實固不足深論，我們關心的還是「流求」在哪裡？〈東夷列傳〉提供兩個參考點，一是上文提過的夷邪久國，《日本書紀》的

⁵² 藤田豐八，《島夷志略校注》「澎湖」條曰：「參高華嶼即今花嶼，龜鼈嶼即今奎壁嶼，屬澎湖。」（頁1-2）；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1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第5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21-22。

⁵³ 參上引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頁106-129。

⁵⁴ 梁嘉彬，〈流求史論正謬〉，原名〈隋代流求國確非臺灣考〉，發表於《國防月刊》（臺北）4：4（1947年12月），收於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107-159。

掖玖（ヤク）既然在琉球列島，主張臺灣說的和田清即使武斷地認定遣隋使「妄言」，卻也無法實指其地；同屬臺灣說的伊能嘉矩則說是南島之總稱，地域廣泛，無法確指。伊能又說掖久與「流求」乃同一原名之轉訛，依照後世日本人的用語，九州以南的海島都稱作「南島」，琉球（沖繩）列島也包括在內；⁵⁵ 但這一來，伊能不又成為臺琉混合說了嗎？

「流求」的另外一個參考點是崑崙，〈東夷列傳〉云：「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崑崙乃南洋之一島，據樊綽《蠻書》，和婆羅門、波斯、闍婆（今爪哇）、渤泥（今婆羅洲）一列相連，此「波斯」即是馬來波斯（Malayan Po-Se），不是伊朗波斯（Iranian Po-Se）。⁵⁶ 所以崑崙當在南洋的區域內，伊能認為土人自稱 Pulo Konnon，當即《新唐書·地理志》所謂的「軍突弄山」，不必坐實到中南半島東南的海島 Pulo Condor 上。⁵⁷ 其人馬來種，中國中古時代有所謂的「昆崙奴」即是，屬於廣大的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就語言溝通來說，流求國人的確比較近臺灣原住民而遠於琉球（沖繩）。臺灣是南島語族的最北島嶼，與昆崙人講話能通，這點對臺灣說比較有利，所以琉球說者才提出昆崙人早來琉球貿易，溝通的語言是琉球話，用來抵銷臺灣說這一有力證據。

四、歷史語言與考古民族學的背後

批判史學首重史料之收集和考信，歷史語言學（philology）分析和民族學比較參照是十九世紀盛行的方法，「流求」研究史可以看到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此一學派的風尚。

《隋書》〈東夷列傳〉和〈陳稜列傳〉保留幾個流求語的語料，如謂「其主歡斯渴刺兜」、「其子島槌」、「小王歡斯老模」，又云歡斯是王姓，渴刺兜是王名。

⁵⁵ 參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4、21。

⁵⁶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 pp. 468-470; 參勞費爾 (Berthold Laufer) 著、杜正勝譯、劉崇鉉校訂，《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頁 336-337。

⁵⁷ 參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 14-15。

可見史臣的看法，「歡斯」是姓氏，「渴刺兜」、「島槌」、「老模」是人名；地名則有「波羅檀（洞）」、「低沒檀（洞）」，「鬥鏤」是樹名；還有表示身分頭銜的王，稱「可老羊」，王妻曰「多拔茶」，村莊首腦曰「烏（烏）了帥」。這十個語詞是當今僅存的流求語，討論流求族屬的重要資料，運用語言分析方法，連帶也是解答流求之所在比較「客觀」的憑藉。

關於這幾個語詞的性質，近現代學者的理解很不一致，主要根源的《隋書》，所謂姓名、稱謂不一定正確；而表示地名的波羅檀洞、低沒檀洞，和表示職官之「烏（烏）了帥」，可能都是音義兼譯的名詞。此外也可能牽涉傳寫訛誤的問題，今本《隋書》的烏了帥，幣原坦發現《冊府元龜》引作「烏了帥」，而「島槌」，有人推測當作「烏槌」。學者研討的基礎資料竟然這麼脆弱，何況語言學方法人各異說，未臻精準，主觀性的選擇自然難以避免。我們不難發現琉球說、臺灣說、以及混合說三大陣營對這些語詞的解釋竟如胡越之懸隔，由此而建構的歷史圖像當然也就南轅北轍了。

十八世紀新井白石首先批判《隋書》的流求語解讀，《南島志》卷上「世系」駁斥《隋書》以歡斯為王姓之不妥，他說，歡斯「即君長之稱，後稱曰按司，曰王子，皆是古遺言也。」後世沖繩語稱王子的「按司」（あぢ，或あんじ），即古流求的「歡斯」，開啟後世琉球說者尋找能與《隋書》流求語詞相對應的沖繩語彙，琉球民俗學之父伊波普猷的研究最為典型。⁵⁸ 伊波氏說南島（按指琉球群島）中稱酋長為「按司」者有沖繩本島、久米島、宮古島和大島等地。八重山沖繩語あんじ的同義詞チャラ或カハラ，近似《隋書》「渴刺兜」的「渴刺」以及「可老羊」的「可老」，都是君長稱號；「兜」與「羊」是助辭。此外還有「烏了帥」「波羅檀洞」皆可在今沖繩找到痕迹。《隋書》王名渴刺兜、土人呼可老羊，王妻多拔茶（據伊波氏作茶），他據琉球方音解釋，渴刺兜（カラトー），即八重語之かハラ，酋長也；兜，語尾詞，無義。可老羊（カラヤン），カラ，君主也，羊，助詞；多拔茶（タマチャ），沖繩諸島謂有能力之女曰玉津（タマツア，或タマチャー）。《隋書》王居曰波羅檀洞，波羅（バラ），古代琉球語之「村」，檀（ダン）同殿，所以バラダン者，國殿之義。《隋書》村有烏（烏）了帥（うら

⁵⁸ 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頁 510-512。

うすい), 琉球語ウラソヒ, 寫作「浦添」(古作「浦襲」), 首府也, 有治國之義, 故治村之烏了帥顯然是村長。「烏」而非「鳥」字, 經幣原坦考察, 見於《冊府元龜·外國部》風俗條所引《隋書》的文字, 並且注明是「日本官名」。⁵⁹

還有決定流求地理方位的龜鼈島, 龜鼈讀作ゲンビ, 即距離那霸一日航程的久米島, 不能跟隨新井白石寫作龜鼈(ユエンビー)而等同於惠平也(よへや)。另外波羅檀, 主張臺灣說的藤田豐八以「波羅檀」對應《溫州府志》的「波羅公」, 其管下之密牙古(みやく)即宮古島, 此說則完全被主琉球說最力的秋山謙藏接受, 可見個別詞彙的相同考證甚至可以作為不同學派的支柱。⁶⁰

伊波普猷批判的對象是臺灣說的伊能嘉矩。伊能氏就這幾個流求語彙, 試圖從近代所知臺灣中部的巴宰族(Pazih)語言找對音, 巴宰語是南島語系之一支, 因而推論流求國在今臺灣中部。伊能氏認為「歡斯」即 Kaishi 之音譯, 巴宰族的家名;「渴刺兜」, 男子之名的慣用語 Harato 也;「島槌」, 亦男子之名之慣稱 Taut;「可老羊」, 擁有神聖地位之祭司頭目 Karaohu;「多拔茶」, 即 Taatah, 部落老女之尊稱。地名「波羅檀」, 對音是 Paradam, 據巴宰族傳說, 葫蘆墩街東方兩公里多的觀音山麓有稱作 Haradam 的小丘, 是族祖初建部落之地。Paradam 音轉作 Haradan, 又訛作 Haluton, 即漢人的葫蘆墩也。「低沒檀」, 巴宰族謂大甲溪為 Tomel, 音近之。烏了帥, 巴宰族番社謂有一團壯丁的社會組織為 Lakelakehal, 可能音轉成 Liau-liau, 近乎閩南語的「烏了」。⁶¹ 伊能氏既引巴宰語, 難通之處連近代閩南話也跑出來, 皆容易流於臆脫, 據我所知, 當今南島語言學家而且研究巴宰語的學者並沒有接受伊能的推測。⁶²

然而同樣使用語言學方法, 不只琉球說者與臺灣說者的詞彙定義不同, 即使

⁵⁹ 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争の批判〉,頁1-20。

⁶⁰ 明萬曆刊本《溫州府志》記載,元延祐4年(1317)永嘉海外發現漂流船,言語不通,尋訪通曉者詢問,得知「係海外婆羅公管下密牙古人民,凡六十餘人,……中途遇風,大船已壞,惟十四人,乘駕小船,飄流至此。」密牙古(宮古)成為《隋書》婆羅檀洞和沖繩繫連的橋樑。參藤田豐八,〈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記錄〉,收於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49-351。秋山謙藏之說見〈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頁93-126。

⁶¹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頁15-19。

⁶² 南島語言學家李壬癸和土田滋(Shigeru Tsuchida)合編《巴宰語詞典(Pazih Dictionary)》(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1),未收錄伊能嘉矩認定的語料,連Introduction也未觸及這個問題,筆者曾詢問李先生,他並不接受伊能的說法。

同屬臺灣說也不一樣。白鳥庫吉就得出與伊能嘉矩截然不同的論點。白鳥氏認為《隋書》所保留的流求語彙都屬於馬來語系，即今日所說的南島語系（Austronesian）。根據他的研究，⁶³ 歡斯即 Kandje，爪哇語的敬語；渴刺兜即馬來語 ratu，王也，所以稱流求國王「歡斯渴刺兜」（Kangdje Karatu），非姓歡斯名渴刺兜，而是國王陛下的意思！同樣「歡斯老模」是對次一級有權力者的尊稱，也不是姓名。馬來語和爪哇語稱父曰 rama，又轉而對王侯的敬稱，流求語「老模」（lao-mo）即馬來語 rama 的音譯，原義為父，轉稱小王。

凡此方法，《隋書》的可老羊、烏了帥、婆羅檀、低沒檀、多拔茶、烏槌等流求語，白鳥氏引證的語料擴及馬來、爪哇、巽他（Sunda）、菲律賓宿霧（Cebu）的 Bisaya、東加、古爪哇 Kawi 等語言，都屬於南島語系，或稱馬來·坡里尼西亞語（Malay-Polynesian）。不論他的對音研究準確度多少，流求人屬於馬來語系的說法倒與陳稜軍隊中的崑崙人「頗解其語」比較符合，所以也成為臺灣說者和田清可資立論的重要依據。

流求在哪裡？以僅存的幾個語料，號稱科學的歷史語言學是無解的。

「流求」研究，語言學之外還有民族學方法，發端也很早，傳統時期，陳侃辨證前史之誤與新井白石為琉球作志，多涉及民族習俗和文化。十九世紀後期，施古德比德理文精緻的地方是著眼於社會文化，他用很大篇幅論述《隋書》流求國的「人種誌」，分居室、政制、衣飾、兵器、戰爭、學術宗教、外貌、風俗習慣，喪事以及鹽酢酒和動物等項目，取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歐洲人士所記載臺灣原住民的民族學、民俗學資料比較互證。然而以這種近代民族習俗印證古代記載的方法，往往流於比傅。

⁶³ 白鳥氏對「可老羊」等語詞的考證如下，參上引白鳥庫吉，〈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頁 595-618。可老羊，馬來語 rāya 形容宏大、莊嚴和嚴肅的樣子，ka、an 是加強語氣的接頭語與接尾語，ka-rāya-an 即宏大、莊嚴的名詞，正與流求語「可老羊」（ka-lao-yang）對音。烏了帥，《文獻通考》作烏了帥。馬來語，頭謂 ulū 或 hūlū，波里尼西里（Polynesia）語系中的爪哇、巽他（Sunda）、Bisaya 等方言謂頭為 ulu，東加（Togai）語謂之 olo，kawi（古爪哇）語稱酋長 ulu。《隋書》村長烏了帥當作「烏了帥」，烏了即馬來語 ulu 的對音，由頭首轉為渠帥的敬稱。馬來語及爪哇語謂國王領土為 paratuan 及 karatuan，ratu 者國王也，pa 與 an 分別為字頭字尾；《隋書》地名的波羅檀即 paratuan 的對音，小王 rama 或 rema，其領地即 pa-rama-an，r、d 對轉，省字頭 pa，rema 或 rama 乃轉為 dema 或 dama，即「低沒」之音譯，低沒檀者即 dema-an，馬來語土地謂之 tĀnah，相當於漢語的「檀」。至於所謂王妻稱作「多拔茶」，即馬來語的 tuwan，不分男女的敬語。「烏槌」當改作「烏槌」，馬來語謂兒子為 putra，流求語王子曰「烏槌」是通稱，不是私名。

《隋書》流求國備述其國之地景、政治組織、武器爭戰、刑罰審判、衣冠佩飾、體質特徵、生活日用、農作家畜、婚喪禮俗和宗教信仰等，稱得上是一篇民族誌。隋煬帝在四年（706-710）內，三度侵入流求國，並且俘虜不少人口，應有足夠的資料撰寫民族誌，唯難以斷言其真實程度。

流求國的農作生產工具是石刀，所謂「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云云。早在1930年代就有人憑當時的考古知識而謂適用於臺灣，不適用於琉球，因為琉球出現開元通寶之流傳，已脫離石器時代。⁶⁴ 不過當時臺灣或琉球的考古資料都極貧乏，不足以論證歷史記載之是非。就農業生產工具而言，不少進入金屬時代的文明，農具仍然是石、木、蚌器，中國輝煌燦爛的青銅時代就是典型例子，何況琉球之見開元通寶，豈足以標識進入金屬時代？但《隋書》曰：流求「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顯然武器已進入金屬時代了，這個流求到底是臺灣還是琉球？

最近三、四十年臺灣考古出土鐵器較多，一般認為兩千年前臺灣已進入鐵器時代，多處考古學文化地區多發現鐵器，北部十三行文化，西部番仔園文化、南部蔦松文化、龜山文化，東部阿美文化。十三行雖然出土規模不小的煉鐵遺址，但所出鐵器只有魚鉤、刀、鏃等輕薄之物，未見戰爭用的刀劍。⁶⁵

至於琉球，過去日本和沖繩學者一直認為沖繩諸島、先島諸島，十二世紀左右以後鐵器才普及，遠在《隋書》記述之後；但最近的資料確知七世紀奄美諸島已開始使用鐵器，⁶⁶ 與《隋書》的記載便不衝突。其實琉球早在彌生時代（前十世紀至三世紀）已有金屬製品，沖繩本島出土中國漢代的三翼銅鏃，而且縣川市宇堅貝塚出土的銅鏃與福建崇安漢代城址所出同類，似乎都是舶來品，非本地之產。⁶⁷ 總之，與臺灣一樣很難符應《隋書》所列的鐵製武器。臺灣研究臺琉古文化異同的考古家也有人認為新石器中期臺灣已有稻米、磨製石刀等農具，同時的

⁶⁴ 甲野勇，〈隋書「流求國傳」の古民族學的考究（豫報）〉，《民族學研究》3: 4（1937年3月），頁691-702。

⁶⁵ 參連照美，〈七世紀到十二世紀的臺灣：臺灣鐵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臺北）53（1998年9月），頁1-11。

⁶⁶ 後藤雅彥著、邱鴻霖譯，〈從沖繩考古學的現狀看與臺灣考古學的接點〉，《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8（2008年6月），頁137-148。

⁶⁷ 參上村俊雄，〈沖繩の先史、古代：交流、交易〉，收於鹿兒島國際大學附置地域総合研究所編，《沖繩對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38。

琉球則尚未有農業，而其鐵器時代也比臺灣為晚。然而後來的變化琉球較大，進入國家階段，臺灣則遲至近代十七世紀尚停留在原始社會，但琉球早已是王國了。⁶⁸

流求論辯各派學說都沒有遺漏民族學方法和考古資料，但和語言分析一般，相同方法卻會得到不同結論。他們分別從前人關於琉球或臺灣的記載，尋找可以印證《隋書》流求國的民族、民俗資料以證成其說。傳統民族誌往往流於寬鬆，比較方法容易取決於作者意向，晚近山里純一分析各派研究論點，就《隋書》流求國傳逐句比較，同一條史料，經過各家倚輕倚重的解釋，多可以符應自己的論說。⁶⁹

誠如上文提到明代的琉球記事往往雜糅《隋書》流求和當代的琉球，以致野蠻與文明熔於一爐，十六世紀三〇年代中國使節陳侃就批評過去諸書「非實事」，所記乃「傳者之妄」；大約同時的黃省曾也說：「前史多不足信」。不過新井白石對文野共存的矛盾另有見解，他說：「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復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哉！」根據日本國史，考諸隋及歷代史書，他發現「古之遺風餘俗猶存於今者，亦不少矣。」（《南島志·序》）他的邏輯很適合後世琉球說的思辨模式，七百年前的「流求」自然猶「野」，七百年後的琉球於是乎「文」，後世底層社會的民俗，不妨當作「古之遺風餘俗猶存於今者」，琉球說自然無往而不利。

然而如果參考古知識，新石器中期猶落後於臺灣的琉球，在彌生後期的七世紀開始與日本接觸，至十二世紀而進入グスク（城，Gusuku）時期，接著出現三山王國。明朝使節所見的琉球王國已經過七百年的文明化，相對的十七世紀西方人遇到的福爾摩沙人，仍停留在原始社會，以這麼不同的社會基礎，尋找史料印證，有適合臺灣說之處也是可能的。

利用近代民族、民俗資料探索《隋書》流求之所在，首推荷蘭的施古德，上文說過這是他發揮法國德理文的臺灣說，而在方法學上更進步的地方。施氏比較《隋書》與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歐洲人關於福爾摩沙人在生活、禮俗和政治等層面的所謂相似性。⁷⁰ 譬如王居及民居，他引郇和（Robert Swinhoe）和 Sainz 神

⁶⁸ 陳有貝，〈從古琉球的歷史發展看臺灣〉，收於陳仲玉、潘建國主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連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頁 303-314。

⁶⁹ 山里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頁 34-57。

⁷⁰ 希格勒（Gustave Schlegel，施古德）撰、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 19〈古琉球國考證〉，頁 170-181。

父所記平埔族的房屋，干闌式建物，茅草覆頂，屋藩以柴柵或傍巖，其居似洞，以對應《隋書》「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的波羅檀洞；引荷蘭東印東公司最後一任臺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被遺誤之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門戶上飾以鹿、彘及其他野獸之頭，以對應《隋書》「王居壁下多聚鬻體，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臺灣原住民裸體雖未見於《隋書》，但男子腰有帶、冠紅帽，婦人服卷腰，以線穿貝為頭圍，紅、白色布纏髮前繞至額，對應《隋書》「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綴毛垂螺為飾，下垂小貝」云云。其實流求國「男子用鳥羽為冠」，經常見於十七、十八世紀清人對土番的記述和歌詠，如謂「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飄各鬥風」，「尤憐雉尾晚搖風」，或「頭上雉毛招颭風。」⁷¹ 其他如「食皆用手」，「銜杯與飲」，亦可以在平埔族找到。

專擅琉球歷史語言學的伊波普猷既然被奉為琉球民俗學之父，他的論述當然不會忽略民俗。他說剔除體毛亦見於古昔之日本，（他主琉球人與日本人屬同民族）人死邑里食其肉，古代沖繩親戚聚集食之，舉證食人肉的親自見聞。「產婦食子衣」，他說此習今宮古島一些地方猶存；而「產後以火自炙，令出汗」，正是沖繩習俗，上世紀二〇年代（伊波論著時）之前二、三十年，也就是十九世紀末，還很盛行。⁷²

晚兩、三個世代的琉球說者中村明藏，其論證也多使用民俗學。《隋書》云：「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文」，他說，沖繩、奄美兩大島的女性近年猶存指甲入墨的習俗，他曾近距離觀察過老婦的實例；而 1930 年代奄美大島北部的調查也有所發現，他曾作文論述文樣資料。至於產後自炙的分娩習俗，他說沖繩產婦近年猶烤火以增溫。近世的奄美大島有類似的習俗，他引幕末薩摩藩士名越左源太被放逐到奄美大島，記述見聞的《南島雜話》「產婦之圖」，產婦之旁有火正燃燒著。其他如沖繩歌曲之哀調可推想古代情景當如《隋書》的「音頗哀怨」，而《隋書》的宴會一人唱眾人和，搖手而舞，現在沖繩的酒宴多可見之。⁷³

⁷¹ 參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3）〉，《大陸雜誌》96: 3（1998年3月），頁1-15。

⁷² 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頁512-517。

⁷³ 中村明藏，〈古代の沖繩と《隋書》流求傳：六～七世紀、沖繩史への接近〉，頁135-136。又參增田勝機，〈習俗からみた琉球の對外關係〉，收於鹿兒島國際大學附置地域綜合研究所編，《沖繩對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199-200。

傳統文獻本身已不夠精確，猶處於原始社會的琉球和臺灣很可能存在著共通的習俗，中馬庚比較《隋書》和《南島志》、《沖繩志》，發現司法科決、歲時文字、面貌體型、父子君臣、髮飾刺青、產婦生育、飲食樂舞等項目，琉球和臺灣多存有共相，唯喪葬有異，野獸家畜亦不同。⁷⁴ 考察《隋書》流求國所述之民風與文化，在南島語族中亦相當普遍。《隋書》說流求國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長相類似西北塞外人種；但如果參照《隋書·南蠻列傳》林邑國，「其人深目高鼻」，也應該屬於東南亞南蠻的大範疇。那麼，流求國就是臺灣嗎？其實深目高鼻或長鼻往往是傳統中國人對不太落後外國人的描述方法，看看歷代的職貢圖就可以了。⁷⁵

《隋書》敘述其國之社會文化和生活禮俗，如食用手指，世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俟草木枯萎以為年歲，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體毛，婦人黥手，綴鐺施釧，懸珠於頸，男女相悅便自相匹偶，銜杯共飲，歌呼蹋蹄，一人唱眾人和，王居所聚鬪體。凡此記載，施古德等流求臺灣說的倡議者認為與一千年後，即十七、十八世紀，西洋和中國的外來者對臺灣原住民族群之記錄頗有相似之處，但 1950 年代陳漢光批評「過去有許多學者根據現在臺灣山地族去研究《隋書·流求傳》是否今之臺灣，是研究方法上的錯誤。」他比較〈流求傳〉與陳第《東番記》（1603）的社會、禮俗、物產和工業，發現二者有別。⁷⁶

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的考察既不可能判斷歷史流求與現實的臺灣或琉球完全吻合，卻往往部分近似，或臺琉共存的現象。然而琉求國的政治組織，依照《隋書》則有一定的鑑別度，不容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其行政體系頗為複雜，分為王、小王和烏（烏）了帥三個階層，王統治全國，小王領有洞，所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洞以下有村，村有烏（烏）了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條謂王歡斯渴刺兜所居曰波羅檀洞，而〈陳稜傳〉謂進軍至低沒檀洞，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或可印證這種階層行政組織。主琉球說的新井白石《南島志》〈地理〉篇述琉球地勢，「依洲島為國」，其國「凡諸島地，山谿崎嶇，罕

⁷⁴ 參上引中馬庚，〈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史學雜誌》8: 11（1897 年 11 月），頁 1066-1093；8: 12（1897 年 12 月），頁 1187-1205。

⁷⁵ 劉芳如、鄭淑方主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頁 10-148。

⁷⁶ 陳漢光，〈「琉求傳」與「東番記」〉，《臺灣風物》（臺北）5: 11/12（1955 年 12 月），頁 1-5。

有寬曠之野」，故易於樹柵築塹；又曰：「其人濱海而居，各自有分界，謂之間切，間切者猶言郡縣也。」同書〈官職〉篇曰：「古時流求諸島地，各有君長，若《隋書》所謂王、小王、鳥（烏）了帥，固其所統大小而所稱亦不同。」其職官之一的按司，新井曰：「猶言郡守也，王子之子有分封者，稱某地按司」；此乃「據今制而言，非古也，古時所稱按司，即君長之稱也。」所謂今制，是指明永樂 20 年（1422）南山王尚巴志統一三山，⁷⁷ 以後的制度，「各地按司皆賜第宅，不得就其封。」新井氏顯然認為《隋書》流求的政治制度符合尚巴志以前琉球的政體。

流求政治之階層制亦伴隨統治禮儀，《隋書》記王和小王出行的威儀曰：

王乘木獸，令左右與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鑿為獸形。

流求國王的衛隊只有數十人，在習於帝國威儀的中國人眼中，實在「其器亦小哉！」雖然小王連這個排場也沒有，下一級的村落頭目鳥（烏）了帥出門更不可能被抬在木椅上。不過，無論如何，多少還是具有階層制的差別待遇，與千年之後外人來臺所見無階級之原始社會，是截然不同的。至於司法方面，流求國

犯罪皆斷於鳥（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

似有頗為複雜的審訊程序，完全超出十七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和中國人在臺灣的知見。如果流求是臺灣，那麼，臺灣歷史曾經歷過從文明到原始的退化過程嗎？

《隋書》所見流求政體階層制，並且一定程度的禮儀化，「臺琉混合說」倡議者里斯，以恒春半島的瑯嶠族具有進步的文化來比附，幣原坦繼之；唯追究其根據，不外是十七世紀荷蘭人的片面觀察。《熱蘭遮城日誌》1636 年 5 月 15 日條，士官 Cristoffel 從瑯嶠回到大員，報告說：

（瑯嶠）這個民族，就像外表所顯示的，在交往中，他們比鄰近村莊的人文明很多，膚色比較白，個子也比較小。他們的首領對屬下也比較權威，上述 Lamlock 的兄弟一個人統治十六個村莊，每個村莊由他指派一個頭

⁷⁷ 尚象賢《中山世鑑》總論曰：「尚巴志為山南王，其政法於先王之舊章，故二山亦半歸之，終發兵一統、都中山、故獨稱中山矣。」又卷三述永樂二十年尚巴志統一及立都首里。尚象賢撰、沖繩縣教育庁文化課編集，《重新校正中山世鑑》。

領。他有很多僕人服侍，那些僕人一直在他周圍，他們也不跟那些黑人一樣裸體走路，穿著衣服，女人甚至於遮著胸乳。妓女和姦淫被他們視為非常可恥的事情，每一個人只能娶一個妻子。如果首領去世，就由長子繼承，同受尊重。⁷⁸

這個瑯嶠首領統治 16 個村莊，村莊各有頭人，構成階層制；有衣冠和繼承制度，風俗醇良，⁷⁹ 這樣可比《隋書》流求國嗎？可以當作如里斯「琉球之餘種」的推論，是古代從琉球列島移到臺灣，後來退居高山的遺裔嗎？

西元 1803 年船長文助漂流至東臺灣，據他觀察說：ドンケヤウ（瑯嶠）據說有冠婚喪葬的禮儀與神佛祭祀的習俗，使用唐山曆法，女子外出必撐傘，男子如唐山一般戴冠或戴笠；死後土葬，再撿骨，無其他奇風異俗，總之，人物、風俗與唐山大體無異。⁸⁰ 幣原坦引述文助的見聞，又根據 1930 年他到臺灣東海岸目睹的經驗，發現瑯嶠系的潘仁才和純支那系的卓春生，兩人風貌骨骼明顯有別。卓氏顏長脊高，還保留髮辮；潘氏脊不高，顏面橫張，雖講福建話，但發音矯激，仍存沖繩人的遺傳。⁸¹

里斯和幣原坦這兩家「混合說」都共同提出臺灣原住民摻雜著古代琉球的移民，幣原氏並且因為《隋書》云流求「厥田良沃」而推斷隋軍是在臺灣南部登陸，而與「臺灣說」和田清所指的臺南附近吻合。這個奇特的瑯嶠族，正反映流求論說即使都援引史料，其實自由心證的成分相當大，所以才如此分歧。

關於流求的政治組織，主張臺灣說者也似乎可引證所謂的大肚王國，但不一定有足夠的說服力，這是過去論辯不曾觸及的。《巴達維亞城日記》1644 年 4 月，中國海盜 Kunwangh（昆旺？）的口供講到 Betgirem（馬芝遴）與 Tamsuji（淡水）之間有 22 個村莊，其中 18 個歸 Quata Ong 統治。Quata Ong，《熱蘭遮城日誌》寫作 Quataongh，1645 年 4 月 5 日至 8 日，他來赤崁（今臺南市區）參加地方會

⁷⁸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237。

⁷⁹ 上引 Ludwig Riess 著、周學普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島史》，頁 4-6。

⁸⁰ 蔡美倩主編，《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編譯本》（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1），頁 45；上引蔡美倩主編，《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愛書覆刻本》，頁 113-117。

⁸¹ 幣原坦，〈琉球・臺灣混同論爭の批判〉，頁 57-58。

議，回答臺灣長官的問話，說他管轄 15 個村莊。他所舉村莊名稱，係在今大肚、沙鹿、清水、龍井、大甲、臺中市、彰化市北區和芬園一帶，⁸² 概括而言，南起大肚溪中下游、北至大甲溪之間。這位 Quata Ong 或 Quataongh，翁佳音考證即大肚王，《熱蘭遮城日誌》也寫作 Takamacha。他說，cha 是閩南語「轄」，管轄也，「大甲轄」就是「大甲王」，也是大肚王。

十七世紀臺灣中部的確有一頗為強大的平埔族，楊英《從征實錄》云：鄭成功來臺，永曆 15 年（1661）七月，因徵糧而「激變大肚土番叛，衝殺左先鋒鎮營，楊祖與戰，被傷敗回，至省（今臺南市）病，死之。」⁸³ 驍勇善戰的鄭家軍竟然落敗，統帥受傷而死，可見大肚王國的剽悍。

據《熱蘭遮城日誌》，當時每村有 30 至 50 個家屋，以 40 戶計算，統轄 18 個村莊的大肚番王治下約有 700 戶，大概 3 萬人左右，可以算是酋邦 (chiefdom)。但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成員 David Wright 記錄番仔王出境的排場，只有一、兩位侍從隨行而已。⁸⁴ 如果這個大肚王國上推一千年，符合《隋書》流求國的政治組織嗎？

《隋書》流求是今之臺灣還是沖繩（琉球），或者兼而有之？從文化、語言而論，都有符合與不符之處，已如前述。我們可以憑藉的歷史事件，海路里程之標識地點只有高華嶼和龜鼈嶼，由於和這兩個島嶼可以印證的有效史料幾近於零，向來的地理考證多屬臆測，南北懸殊甚大。那麼主張臺灣說的和田清以高華嶼即南澳島，龜鼈嶼在澎湖，而琉球說的梁嘉彬則以龜鼈嶼為久米島，高華嶼為基隆外海的彭佳嶼或棉花嶼或花瓶嶼，他們都想符應史書所記一日、二日之水程而坐實臺灣或沖繩。⁸⁵ 不過，隋軍的航程，史書只留下最後幾天，並不是全程日記，很難定位。

⁸² 參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 4（1992 年 12 月），頁 145-188。

⁸³ 楊英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從征實錄》（臺北：該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32 種，1958），頁 191。

⁸⁴ Rev. W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p. 6.

⁸⁵ 和田清，〈琉球臺灣的名稱に就いて〉，頁 106-129；梁嘉彬，〈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臺灣文獻》9: 2（1958 年 8 月），頁 1-16，收於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 293-321。

五、唐宋傳聞：貿易之鄉與食人之地

流求國無來由遭受隋帝國的攻伐劫掠後，《隋書》云：「自爾遂絕」，唐宋兩朝不再進入中國官方的歷史舞臺。唐時的記敘，杜佑《通典》只抄襲《隋書》，沒有增加新資訊，雖然官書闕如，民間仍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傳達當時的認識，早年臺灣的學者尋查一些唐宋元時期的資料，⁸⁶ 企圖由此上推隋代流求國。這些記述有的文藝趣味太重，失之於籠統，但也有一些信息可供分析，綜合來看，流求社會的圖像卻是兩極化的。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韓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鄭權出任嶺南節度使，《舊唐書》卷 162 本傳)他們分別撰寫的贈行文章都提到「流求」。韓愈〈送鄭尚書序〉云：

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⁸⁷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全唐文》卷 556)⁸⁸

從耽浮羅(今濟州島)以下是中國東邊海外諸國，流求、夷州分別言之，不像近代有些人合而為一，林邑等則在南海外。唐時這些國家過海到廣州，貿易相當發達，流求國即是其中之一。柳宗元〈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亦曰：

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全唐文》卷 580)⁸⁹

⁸⁶ 參上引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1963)、陳漢光〈唐宋時代的流求文獻〉(1970)、盛清沂〈宋元臺灣史事考〉(1975)、黃寬重〈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1986)。

⁸⁷ 于陀利，「于」當係「干」之訛。《梁書》作「干陀利」，(卷 2 天監元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及卷 54 海南諸國「干陀利國」條)《宋書》訛作「斤陀利」，(卷 6 孝建 2 年八月條)「于」、「斤」皆是「干」字形近之誤。干陀利一說即梵文地名 Kandari 之音譯，據考在今蘇門答臘巨港(Palembang)一帶；或謂在馬來半島的吉打(Kedah)或金丹(Kintan)。參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編，《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22-123。

⁸⁸ 韓愈，〈送鄭尚書序〉，收於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556，頁 5626b。

⁸⁹ 柳宗元，〈嶺南節度饗軍堂記〉，收於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80，頁 5859a。

訶陵又稱闍婆，在今爪哇中部。嶺南節度使轄下的押蕃舶使主管海外貿易，東起流求，南至爪哇，西及中亞，環海百數十國。

這個海外貿易鼎盛的流求是臺灣或是沖繩？唐代兩大文豪皆無說。

同時代日本也有關於流求的記述，真言宗開山祖師空海（774-835）〈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是討論流求問題的日本學者經常引用的資料。唐德宗時，日本桓武天皇派遣太政官右大辨正三品兼行越前國太守藤原朝臣賀能出使大唐，藤原使節團在福州登陸，空海代賀能修書給福州觀察使，備述海上之險惡云：

賀能等忘身銜命，冒死入海。既辭本涯，比及中途，暴雨穿帆，戕風折柁，高波拔漢，短舟裔裔。

天災之外，還有人禍，

凱風朝扇，摧肝耽羅之狼心；北氣夕發，失膽留求之虎性。⁹⁰

出使路線從京都啟程，先到九州北岸太宰府（今福岡附近），出博多灣，西行轉南，往福州。在海上，若吹南風（凱風），將飄到耽羅（濟州島）；吹北風，則飄往留求。兩地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可怕的狼虎之國。

「留求」即是流求，稍晚的日僧智證大師圓珍寫作「流隸」。唐宣宗大中7年、日本文德天皇仁壽3年（853），圓珍從大宰府搭大唐商人欽良暉的船入唐求法。《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二「智證大師」條記其行程如下：

八月九日……欽良暉船進發過海。時東風忽迅，舟行如飛。十三日申時，北風俄起。十四日辰時漂著流隸國。流隸者，所謂海中啖人之國也。⁹¹

北風把船往南吹，漂到流求國。當時日本傳說，流求是海中吃人之國。禍不單行，「時四方無風，不知所趣。」帆船停滯不動，但「遙見數十人持戈徘徊岸上」，情勢至為緊張，船主哀號，怕為流求人所食，和尚合掌默念不動明王，這明王曾

⁹⁰ 空海著，渡邊照宏、宮坂宥勝校注，《三教指歸：性靈集》（東京：岩波書店，1965），卷5，頁267。

⁹¹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宗性、虎闍師鍊編，《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元亨釋書》（東京：吉川弘文館，1930），《國史大系》第31卷，頁53-54。

託夢提醒他可速速完成入唐求法的宿願。果然神異，須臾間「前年（夢中）所現金色人露立舳上，時舟中數十人見之。」

俄而巽風忽發，飛帆指乾維，十五日午時，著大唐嶺南道福州（原文如此）連江縣界。

巽乾直線相對，按文王八卦方位，巽在東南，乾在西北。巽風即東南風，風起，船乃航向西北，所謂直指乾維，一日夜之後抵達福州府的連江縣界。從方位看，這個流求不正是臺灣嗎？

然而食人國流求與「蠻胡賈人，舶交海中」，海外貿易繁盛的流求，這兩幅歷史圖像顯然難以並存。曹永和參證唐宋元三朝其他資料，而謂明代以前有兩種流求混淆不清，閩粵商賈貿易的流求似可認為今日琉球，而商賈不通的流求是今日臺灣。⁹²

史籍「流求」是隋人付予的國名，大業 4 年（608）倭國使者小野妹子看到朱寬取回的布甲，說「此夷邪久國所用也。」邪久，日本又作掖玖、夜句，即今沖繩北部靠近九州的屋久島，據《日本書紀》，其歷史記錄始見於推古天皇 24 年（616），在隋軍伐流求國以後六年。爾後交通日本者，掖玖之外又有多禰（種子島）、阿麻彌（大島）、多禰、菴美、度感（德島）、信覺（石垣島）、球美（久米島），《日本書紀》與《續日本紀》都有記載，涵蓋今日沖繩南北，⁹³ 時間從西元 631 年至 714 年之間，諸島獨立，尚無統一國家。故知至八世紀，日本官方對沖繩已不陌生。那麼，九世紀上半葉空海及中期圓珍所講的「留求」「流求」應該不是同時唐帝國兩大歷史人物柳宗元、韓愈筆下的「流求」。

北宋李復「與喬叔彥通判書」提及他見過張士遜（964-1049）任邵武知縣時編集的《閩中異事》，講到「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又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至流球國。「其國別置館於海隅，以待中華之客。……問耆老云：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去泉州不甚遠，必有海商往來，可尋之。」⁹⁴ 這個張士遜講的海北流求國當即琉球（沖繩）與百

⁹² 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頁 204。

⁹³ 參山里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頁 7-11、16-17。

⁹⁴ 李復，〈湧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 5 〈與喬叔彥通判〉，頁 19-20。

餘年前韓、柳所講「蠻胡賈人，舶交海中」的流求當同一國。其謂中國商人來此貿易，限居住於海濱，也很合理，以後日本、中國都有類似的限制。⁹⁵

唐人所知海外貿易興旺的流求，⁹⁶ 北宋蔡襄也有類似的看法，其《荔枝譜》云，福州種植荔枝，有一家萬枝之盛，「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先預約，不論收成豐寡或品質美惡，都不會毀約，而以紅鹽淹漬，國內主銷京師，海外「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流求和日本、阿拉伯同樣具購買力。元朝蘇天爵收集到宋本〈舶上謠〉十首，多述以番貨奉使事，其第二首流求和真蠟、闍婆並稱，「番船去時遣碇石，年年到處海無波。」第八首番貨中云：「薰陸胡椒臘朮齊，明珠象齒駭雞犀」，都是南海的昂貴商品。元末楊翮也說，真臘、占城、流求諸國蕃舶歲至嶺南近海諸郡，中國人視為瑰奇異珍的象牙、犀角、珠璣、金貝、名香、寶布，「咸萃于是。」

如是，流求早已投入東南亞及南洋的高價值商品貿易，絕非當時及以後幾百年的臺灣所可想像。然而提舉福建路市舶（總管福建海外貿易）趙汝适的《諸蕃志》（1225年序），則言流求國「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土人間以所產黃蠟、土金，鼈尾、豹脯往售三嶼。」三嶼（Sam-sü），三個島嶼，《諸蕃志》云：「乃麻逸之屬」，據夏德（Hirth）考證，在今菲律賓呂宋島之南的民都洛（Mindoro）。⁹⁷ 南宋趙汝适認知的流求便和北宋蔡襄以及宋人歌謠的流求顯然不同。《諸蕃志》是趙汝适「詢諸賈胡，……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蕃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實實」而成的書，雖然不像汪大淵親歷，但消息來源是可靠的。趙汝适在泉州任官，蔡襄是仙遊人，都屬閩南，時代相差不過一百五十年，但兩人所講的流求（琉球）似乎又不盡相同。元代遊歷海外諸國的汪大淵，其《島夷志略》曰：琉球「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和趙汝适傳遞的資訊相近。

從唐到宋，關於流求的記述如此抵觸，顯示當時傳聞的歧異，甚至有文明與野蠻的兩極化現象。不過明洪武5年詔告中山國後，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琉球開

⁹⁵ 鎖國時期長崎的出島，是日本限居荷蘭商旅之地，而清朝政府對付廣州外商的十三行，亦限居在城外珠江邊，不許與本國人雜處。

⁹⁶ 以下宋元資料參曹永和上引書《中國海洋史論集》，頁199-204。

⁹⁷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p. 160. [按：夏德「三嶼」讀作 San-sü，見上引書，p. 161]。

始進行朝貢貿易，明帝國官方向琉球購買的馬匹和琉磺都是戰略物質，朝貢團成員則准許攜帶方物特產到中國出售。《明史·外國四》琉球條云：「洪武二十三年（1390），中山來貢，其通事私携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入都為門者所獲，當入官。」所謂私攜係謂法定額度之外，乳香、胡椒皆南洋之產，可見琉球早已經營南中國海的貿易。《明史》琉球人之持有南洋特產也可以在高麗史書得到印證。上引《明史》記事的十七年之後，西元 1389 年，《高麗史》曰：琉球國中山王察度「獻方物硫黃三百斤、蘇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甲二十部。」（辛昌元年八月）凡此中韓史料都是十四世紀的事。

指出琉球人通商南洋的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是先驅，爾後主張琉球說的秋山謙藏利用東西方史料考證十五、十六世紀琉球人循季風每年來往於那霸和麻六甲之間從事海外貿易，不但 1513 年葡王 Manuel 一世致教皇 Leo 十世的書信可證，朝鮮和明朝也多有記載。據他考察首里王城麓尚侯爵家所藏家譜，其中蔡、紅、鄭、金數家，從明宣德 7 年（1432）至隆慶 4 年（1570）這一百四十年間，往南中國海貿易竟達四十回之多，所到國家包括安南、暹羅、太泥、滿刺加、蘇門答刺、巡達（Sunda）、爪哇。⁹⁸ 故他認為當時的琉球絕不封閉，和慶長 14 年（1609）島津氏進入以後淪為傀儡的情況完全不同。琉球早以其位於東中國海中央的優越地理位置，開始與中國、朝鮮和日本貿易，遠及東南亞、南洋諸國，而在尚真王（1477-1526 在位）時期達到鼎盛。⁹⁹

以上推測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那麼唐宋人說流求有南海寶貨，及設海隅別館待中華之客，或非捕風捉影，則這個流求應該就是沖繩了。參證彌生時代後期琉球列島出土的中國古錢，從戰國明刀、秦半兩、漢五銖、新（王莽）貨泉、貨布，以及唐代開元通寶，近年考古時有所見。今知自七世紀到グスク時代，奄美、沖繩諸島有 13 處遺址出土開元通寶 81 枚，遠多於九州島的出土。尤其久米島北原貝塚就出土 13 枚，考古家推測可能與遣唐使之船寄泊有關；但八重山地

⁹⁸ 藤田豐八，〈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記錄〉，頁 348-356；秋山謙藏，〈Gores は琉球人である〉，《史學雜誌》39: 3（1928 年 3 月），頁 268-285；又秋山謙藏，〈Gores なる名稱の發生とその歴史的發展〉，《史學雜誌》39: 12（1928 年 12 月），頁 233-256。葡王書信秋山氏引自 Afonso Dalboquerque,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so Dalboquerque, Second Viceroy of India*, ed., with Note and an Introduction, by Walter de Gray Birch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⁹⁹ 秋山謙藏，上引〈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頁 93-126。

區石垣、西表之發現開元通寶，應該別有其他接觸交通的途徑。¹⁰⁰ 那麼中國唐宋少數文獻所傳當時沖繩有海外貿易，是很可能的。

流求所在的認識已夠叢脞了，到南宋，又增加了毗舍耶和澎湖，再多一層混淆。趙汝适《諸蕃志》「流求國」條說，其「旁有毗舍耶、談馬顏等國。」同書「毗舍耶」條說：泉州「有海島曰澎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可見澎湖「附近」（密邇）有一個島，叫做毗舍耶，可以望見煙火。

成書於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的《諸蕃志》，根據曹永和的考證，¹⁰¹ 其毗舍耶資訊當來自稍早的樓鑰（d.1213）和周必大（d.1204），他們分別記述宋孝宗乾道7年（1171）毗舍耶侵襲平湖的事件。樓鑰《攻媿集》卷88〈汪大猷行狀〉說：大猷知泉州，「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號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餘人，殲其渠帥，餘分配諸郡。」汪大猷俘虜入侵平湖的毗舍耶人四百餘，戰事規模之大，可想而知。由於「遣戍為備，更迭勞擾」，遂「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毗舍邪）不敢犯境。」這個平湖所居軍民人數應該不少。周必大《文忠集》卷67〈汪大猷神道碑〉同記此事，亦曰：

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颿奄至，肌體漆黑，語言不通，種植皆為所獲。

《諸蕃志》、《文獻通考》和《宋史》所描繪毗舍耶人的原始、野蠻，大概皆根據此事的傳聞。然而屬於泉州府管轄的「海中大洲」平湖，是許多學者認定的今日澎湖嗎？當時平湖的農作之發達，養活人口之多，恐怕和近代以來澎湖的實況天差地別。

胡建偉《澎湖紀略》（1771年序）〈土產紀〉曰：澎湖不但無崇嶺密林，連大地之毛的草木也缺如，至於樹木，衙署屋舍有牆遮風者間植一、二株，不能高出牆外，只能種榕、柳，其他樹木都不能活。賤卉之草，長不滿尺，至於花木，從內地帶來，不久即萎枯。「此非人事之不齊，實水土使然。」五穀僅有高粱、小

¹⁰⁰ 上村俊雄，〈沖繩の先史、古代：交流、交易〉，上引《沖繩對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51-64。

¹⁰¹ 以下樓鑰、周必大和真德秀的記敘間引自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91、93、99。

米、地瓜，雜糧，因為土地礮瘠，風多雨少，「雖有上農，亦何所施其力哉！」¹⁰² 一百二十年後，林豪的《澎湖廳志》〈物產〉序概括澎湖生產條件曰：「海濱斥鹵，土性礮瘠，泉源不淪，雨露鮮滋，地之所產微矣。」¹⁰³ 凡此紀述即使到科技發達的今日，澎湖農產基本上沒有進展。所以一千年前樓鑰、周必大的「平湖」很難等同於澎湖，應該別有其地。

南宋真德秀則說到澎湖。毗舍耶騷擾福建海濱當確有其事，不只汪大猷「留屯水軍」(〈神道碑〉)防禦毗舍耶再犯，後來真德秀知泉州，於嘉定 11 年(1218)報請中央在水澳建立永寧寨，以備「毗舍耶國入寇」。真德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說：

毗舍耶國……其地關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

既說毗舍耶國距離澎湖一日一夜的航程，即是清朝時代航行臺澎間的路線；又說從流求國可以望見澎湖煙火，毗舍耶很可能是今之臺灣。但他們是四十多年前侵擾平湖的毗舍耶嗎？平湖、澎湖、毗舍耶、流求這些地點如何安置在正確的地理位置呢？

官修《宋史》和私人著述如《文獻通考》和《島夷誌略》，都將流求與毗舍耶或合一，或並存，二者的關係也似有若無。《文獻通考·四裔考》「琉球」條：「琉球國，居海島，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眙，殆非人類。」《宋史·外國列傳》流求國之「旁有毗舍耶國」，是何所指呢？文獻不明。而《島夷誌略》的開篇「琉球」條，其末云：「海外諸國，蓋由此始。」接著「毗舍耶」條云：「僻居海東之一隅，山平曠。」所謂「海東一隅」是以琉球作立足點嗎？亦不明。

總而言之，不論是帝國中央無端出兵侵略流求，或泉州濱海人民遭到毗舍耶劫掠騷擾，中國的確和海外蠻夷交過手，但直到元朝以前始終無法確指其地，才讓近代學者大捉迷藏。到了明朝出使，中國官方記載的琉球應該明確了，但往往又摻合《隋書》以來的流求記述，可見模糊的流求一直糾纏著中國人的認知。

¹⁰² 胡建偉，《澎湖紀略》(文叢第 109 種，1961；1771 年原刊)，頁 160。

¹⁰³ 林豪，《澎湖廳志》(文叢第 164 種，1963；1884 年原刊)，頁 331。

六、迷濛中逐漸浮現的琉球

唐宋文野截然不同的「流求」，同名而別異，不能作為「臺琉混合論」二者合而為一的典據；從元代人追究流求在哪裡而發生的命案，也可見當時中國人還沒有把臺灣和琉球當作一個地方看待。

明初編纂的《元史·外夷列傳》(卷210)瑠求條曰，「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從方位看，這個「外夷最小而險」的島國瑠求顯然是臺灣。明初的史官認為「漢唐以來，史所不載」，所以這篇〈瑠求傳〉便沒將過去的流求或琉球資料闖入，更不必說什麼夷州了。《元史》編纂極其倉促，多承襲元朝舊作，可以視為元人的見解。

這個瑠求國不但中國政令所不及，唐宋以來日益發展的東亞海上貿易商人也沒到過，《元史》「瑠求」故曰：「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元史》本傳只記兩件事，第一次發生在世祖晚年，忽必烈熱中招徠海外諸國，至元28(1291)海缸副萬戶楊祥主動請纓，欲領兵招降瑠求。世祖加派吳志斗為禮部員外郎、阮鑒為兵部員外郎，輔助楊祥出使，交待先招諭，「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

吳志斗是書生，上書世祖說，他「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元史·外國列傳》「瑠求」)志斗在京城結交名流，可能有些名氣，這次出使，大名鼎鼎的趙孟頫和翰林侍講學士張之翰都贈詩送行。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四〈送吳禮部奉旨詣澎湖〉，肯定吳志斗「為國建長策，此行非偶然」，明言「止戈方見武，入海不求仙」，期待他「早歸承聖渥，圖像上凌煙。」¹⁰⁴張之翰《西巖集》卷三〈送吳泉陽使琉球〉，(志斗泉陽人，故如是稱)詩云：「建安郡東有琉球，八百年不通中州，天清風靜曾極目，依稀但見雲煙浮。」東海上向來就縹緲不清，但「人言此地足奇貨，上請便欲一鼓收。」誰向皇帝請求武力征服(一鼓收)?暗指楊祥，《元史》〈瑠求記〉有所記述，但吳志斗提出異議，「吳君生長閩海曲，獨謂何足煩戈矛。九重許辨非與是，折渠不倒不肯休；朝堂諸公為動色，一書能止百

¹⁰⁴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元刊本。

萬之貔貅。」¹⁰⁵ 原來在忽必烈決策之前，朝廷有過激烈的論辯，吳志斗一介書生，揚論廟堂，看來這位蒙古皇帝真能廣納民意。《元史》「瑠求」記載志斗主張「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此可與張之翰詩相互印證，因而得罪了一開始就主張動武的未來長官楊祥。楊氏武人，好大喜功，耀武揚威，但元世祖最後採納吳志斗的建議，因而種下志斗日後殺身之禍。

次年（1292）陰曆 3 月 29 日，元兵「自汀路尾澳舟往，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楊祥斷言是瑠求國，阮鑿不敢確定。楊祥改乘小船，抵達山下，沒登陸，只派軍官劉閏領二百餘卒上岸，並且帶三嶼人陳輝當翻譯，但三嶼的語言不通瑠求，元兵被殺了三人，逃回船上。

這隻軍隊 4 月 2 日返回澎湖，楊祥逼迫吳志斗和阮鑿在給皇帝的報告寫上「已到瑠求」四字，二人不從。第二天，志斗卻離奇失蹤。因為志斗曾經指責楊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所以同袍都懷疑被祥謀殺。楊祥則反咬一口說：志斗先說瑠求不可往，今既已到達，遂畏罪潛逃。志斗之妻提起訴訟，世祖下令楊祥、阮鑿回福建對質，後遇大赦，於是不了了之。

因為世祖諭降詔書提到「瑠求邇閩境」，既然起用「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的吳志斗，他一開始在朝廷辯論，建言「就彭湖發船往諭」，而獲得世祖的首肯，趙孟頫詩題亦曰「奉旨詣彭湖」。元軍當從澎湖出兵，出航港口汀路尾澳當今何地？學界紛歧，十餘位論者有六種說法。¹⁰⁶ 元帝國遠征軍自海上東望的長脈低丘是不是臺灣？帆船時代，開船多在黎明，至巳時約六小時。澎湖到臺灣航程一日夜，所以遠望的低山仍難確定必是臺灣。當時對這裡是否瑠求國並沒有共識，高級將領只有「生事要功」的楊祥堅持肯定的態度，吳志斗和阮鑿皆存疑，不願背書，可見元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瑠求」仍難指定即是臺灣。史家論斷曰：「（至元）二十九年，楊祥、阮鑿果不能達瑠求而還，誌斗死於行，時人疑為祥所殺。」（《元史·世祖本紀》）可以確定的是這次元軍未到達琉球。

帆船離不了風，元遠征軍出航日期選在三月底，所要借助的風力是西南季風還是東北季風呢？陳侃《使琉球錄》云從福州赴琉球，「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

¹⁰⁵ 張之翰，《西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3-4。

¹⁰⁶ 參吳培基、賴阿蕊，〈元代汀路尾澳及琉球國考證〉，收於紀麗美總編輯，《澎湖研究：第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1），頁 39-63。

這是由南而北的航期，所以元軍有可能往偏北的針路航行。不過陰曆三月底，春去夏來之際，也有可能還吹東北風，這裡又出現三嶼這個地名，使得元軍的去向撲朔迷離。《元史·外夷列傳》記載吳志斗事件後的第二年（1293），世祖「命選人招誘」三嶼，中書省平章政事（丞相副貳）伯顏召集群臣參議，向皇帝報告說：「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1292）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原來中國政府所謂的招撫含有攻伐併吞的意味，三嶼國弱小而順從，楊祥率領的軍隊經過時，提供糧草補給，騰出公館給軍官住宿。上面提到楊祥帶領的船隊自澎湖出發，不到中午時分看到長低山脈，軍官劉閏登岸，被原住民攻擊退回船上。史書接著記載「四月二日，至澎湖」，中間這兩、三天，根據副宰相伯顏的無心史料，我們於是知道楊祥這批人是去了三嶼，過一宿折回澎湖。三嶼在哪裡？《諸蕃志》卷上三嶼條曰：「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姥西、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舶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三嶼」。麻逸國條則指明麻逸在渤泥之北。渤泥即今 Borneo（婆羅洲），麻逸（Mait），即今菲律賓的 Mindoro（民都洛），而所屬的三個島（三嶼）可能對應今日的 Calamianes、Palawan 和 Busuanga，¹⁰⁷ 都在菲律賓。三嶼人到泉州經商，所以楊祥大軍受到很周到的招待，他們這隻遠征軍是從澎湖往南而非往北，所以不可能到琉球（沖繩），至於小部隊登岸被殺三人的那個長而低之山丘，更難扣上「瑠求」兩字。

元帝國第二次出兵瑠求是在成宗朝，楊祥之後五年（1297），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向中央報備要招伐瑠求，「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這支福建兵是到達瑠求國了，而且小有虜獲，可惜《元史》未記其進軍之方位里程，無法標定瑠求的位置。高興既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元史·外夷》三嶼條也說：「三嶼國，近瑠求。……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泉州、三嶼、瑠求三點之「近」字又怎麼理解？看來瑠求理解為臺灣似乎比琉球（沖繩）為宜，但從吳志斗拒絕造假謊稱「已到瑠求」來看，臺灣也不必然合理。

¹⁰⁷ 參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pp. 159-162；趙汝适撰、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 83-85。

從近代學者考訂的三嶼所在而論，元代瑠求以在澎湖之南為宜，但據楊之翰送吳志斗詩提到「此地（瑠求）足奇貨」，民間貿易往來早已存在，則和唐宋所傳海上貿易頻繁的流求吻合。這個瑠求，如上文所論，顯然又適用於今之琉球（沖繩），可見直到十三世紀末，可靠文獻仍難明確指定其所在。到明太祖時，雙方建立正式邦交，記載應該清楚明確，然而《大明一統志》（1461）〈外夷〉「琉球國」條，所記史事仍然將隋代的流求、元代的瑠求和明朝遣使冊封的琉球雜糅，述風俗則抄引《太平寰宇記》，而後者只是《隋書》「流求國」條的節本而已。如果我們追問明人，有足夠文獻證明當時的琉球即古之流求嗎？顯然沒有；然而當時言琉球者多擺脫不了《隋書》的籠罩，中國人習於相信書本所記，更甚於目見耳聞，文獻權威之大可以想見。

史籍雜抄，明之琉球與隋之流求合一，暴露文明與野蠻並存的矛盾，十六世紀的黃省曾遂批評《隋書》「言琉球無馬」之誤，因為洪武年間琉球「屢貢良馬」，明帝國並且向琉球購馬，何來琉球無馬？他遂論斷「前史多不足信」。¹⁰⁸ 嘉靖 12 年（1533）出使琉球的陳侃，返國後撰著《使琉球錄》一卷，乃特立「群書質異」，據其親身見聞，批判《大明一統志》、《羸蟲錄》、《星槎勝覽》和《集事淵海》的謬誤，¹⁰⁹ 其針對源自《隋書》者，如云貴族之妻「無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國家防衛，「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為險。」王之居所「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體為佳之說。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土產「無門鏤樹，亦無胡椒硫黃」；野獸，「無熊羆豺狼虎豹。」現實之「琉球」遂和記載之「流求」切開，明末茅元儀纂輯的《武備志》接受《使琉球錄》，而論過去諸多著述「非實事」，斷言「傳者妄」。¹¹⁰（卷 236「琉球」）

總之，隋流求、明琉球以及稍後認識的東番，即流求—沖繩—臺灣的糾結，由於中國人長久以來對東邊海中的認知模糊，才造成史學界百餘年來紛爭難解。但進到明代，大概進入十六世紀後期，沖繩和臺灣就明確分離了。關於琉球和臺灣的權威記載，官書到《明史稿》和《明史》就完全確立，二書的琉球皆指今之沖繩，臺灣則稱作鷄籠山。以「鷄籠」名臺灣，可能始於明末張燮的《東西洋考》，

¹⁰⁸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 2「琉球國第九」，頁 521-524。

¹⁰⁹ 陳侃，《使琉球錄》，頁 24-38。

¹¹⁰ 茅元儀輯，《武備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第 22 冊，頁 10034。

曰：「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又說東番「不在東西洋之數」。(卷5「東番考」)¹¹¹ 臺灣雖然是福建往琉球、日本或呂宋的航行座標，路線所經，但荷蘭入據前卻不曾成為國際貿易地點。從福州出海的航線圖，雞籠作為針路的一個坐標，中國人遂以雞籠山稱臺灣，範圍當限於臺灣北部而已。閩南漳泉到呂宋的東洋航線，臺灣南部的近海山峰也作為針路坐標，中國人認識南臺灣先名「北港」，後稱「大員」，南北通稱則曰「東番」。¹¹² 中國對臺灣的認識大概晚到十七世紀初才算得上明確。1603年閩人陳第親履大員，回去寫了〈東番記〉，這可能是中國人對臺灣第一部可信的民族誌，收在《閩海贈言》中，上世紀六〇年代經方豪發掘出來，¹¹³ 引起學界注意，尤其臺灣史研究興旺後，已廣為臺灣史讀者所熟悉。

明代確定沖繩為琉球，同時還有一個海島叫做「小琉球」。元明之際的周致中，在洪武年間纂作《異域志》，¹¹⁴ 上卷「大琉球國」和「小琉球國」並列。大琉球國「在建安之東，去海五百里，其國多山洞。各部落酋長皆稱小王，至生分，彼此不和。常入中國進貢，王子及陪臣皆入太學讀書。」周氏著書早於陳侃出使約一百五十年，明與琉球正式邦交剛剛啟動不久，難怪他認知的琉球國既有《隋書》流求的成分，也有明代琉球的事實，屬於上述雜糅混淆的著作。至於小琉球國，「與大琉球國同，其人龔俗，少入中國，風俗與倭夷相似。」這會是今天的什麼地方？說風俗同於日本，亦捕風捉影之談。

萬曆初年嚴從簡《殊域周咨錄》(1583)卷4云：「《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他進一步說明：「小琉球不通往來，未嘗朝貢，則今之奉勅封為

¹¹¹ 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萬曆丁巳(1617)、戊午(1618)序，光緒14年(1888)秋月長沙惜陰書局重刊，頁181。

¹¹² 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據萬曆44年(1616)福建巡撫黃承玄奏疏，論斷「明季有識之士認為雞籠在北，東番在南，顯然不認為同在一個大島嶼。」見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40(2007年12月)，頁93-148。不過同時的張燮並不這麼區分，他的看法除稍早十五年的陳第〈東番記〉可以佐證外，稍晚七、八年荷蘭人實測的第一張臺灣地圖名作「北港」(PACKAN)也可證實。參 Noordeloos 繪製，約1625，見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39。又參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臺北)21:2(2003年12月)，頁249-278。

¹¹³ 參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臺北)7(1956年4月)，頁41-76，收於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835-880。

¹¹⁴ 周致中撰、陸峻嶺校注，《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4。

中山王者，乃大琉球國也。」所謂《祖訓》是明太祖之訓諭，那麼明初官方確定已有大小琉球之分。¹¹⁵ 小琉球和中國沒有邦交往來，未納入朝貢體系內；早於嚴從簡半世紀出使琉球的陳侃在《使琉球錄》特別分辨大、小琉球說：

閩中士大夫常曰：「霽月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日，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

居住在省城福州的士大夫對琉球的認識依然是傳統式的，不像有出使經驗的陳侃能分別大小琉球。《籌海圖編》卷 2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條曰：「梅花（所）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鷄籠嶼及梅花瓶、彭嘉山。」¹¹⁶ 小琉球當指北臺灣，所以閩中士大夫說，天晴氣朗時，在福州有機會望見的小琉球，當是臺灣北部山巔或基隆外海的島嶼，即《明史·外國四》所稱的鷄籠或鷄籠山。按上引《籌海圖編》的針路，彭嘉山之後經釣魚嶼、黃麻嶼、赤坎嶼、古米山、馬山，至大琉球，在大琉球那霸港泊船。大琉球即今之沖繩，但小琉球卻只是北臺灣作為航行坐標的山或島而已。另外《皇明世法錄》卷 80「琉球」條云：「從長樂、廣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即所謂小琉球者也。去閩省東鄙臺礪、東湧，水程特數更，南為東番諸山。」¹¹⁷ 按陳仁錫之說，小琉球乃福建至琉球途中之一島，可見明末的認識，小琉球不是東番。

由於《世法錄》在小琉球之外，明言別有東番，所以明晚期中國人的小琉球並非臺灣。

但西方人的認知卻不同，近世歐洲製作地圖之有大、小琉球，可以上推到十六世紀下半葉，當係他們從南洋航往日本途中之見聞和想像。日本中村拓收集此時西方人所作的東亞地圖，東中國海島鏈，南起菲律賓，北至九州，中間一系列島嶼，「大琉球」（Lequio mayor, llequio grande）在北，「小琉球」（Lequio menor, llequio peqeno）在南，大約相當於沖繩和臺灣的位置，¹¹⁸ 只有少數地圖，沖繩

¹¹⁵ 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63。

¹¹⁶ 胡宗憲，《籌海圖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8。

¹¹⁷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2115-2116。

¹¹⁸ 中村拓，《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III》（東京：東洋文庫，1967）。相關圖版參看(I)無名氏「葡萄牙製平面世界圖」，約 1545-1548；(IV) Daniel Cellarius, “Asiae Novissima Tabvia”（東亞圖），1578；(V) Andre Thevet, “Carte des Provinces de la Grande et Petite Asie”（亞細亞圖），1581；(IX) Joan

標識 Lequio，臺灣注記 Formosa。¹¹⁹ 然而西方人和中國人一樣，對大琉球與小琉球或福爾摩沙的分別認識亦經過由晦而明的過程，早先臺灣在地圖上被畫成三個島嶼，在南者標識小琉球或琉球，在北者福爾摩沙，及至知道只一個島了，有的地圖仍標記「琉球或福爾摩沙島」(Loqucio Ò Formosa I.)，¹²⁰ 可見即使近代學界比較信任的西方地圖，對於沖繩到臺灣之間列島名稱，依然模糊，不敢確指。

七、「流求」史論的表與裡

從隋代以下，歷唐、宋、元到明初，中國與日本文獻所記載的流求、瑠求或琉球，以及其他同音字詞，到底是今日何地？本文分析一百多年來各說的歧異與得失，因為憑藉的記載不夠精確，所以難有絕對的說服力，根本原因由於自古以來中國人對東邊海上的認識模糊之故。我們關注史料的可信度，以及歷史家在專門考證論辨之餘，也要注意他們所流露的關懷和潛存的非學術考慮。在學術論著中，學者往往不會表露他的心路歷程，但這方面的訊息其實與冠冕堂皇的論著不無關係，有可能影響史家建構的歷史圖像，也可以透視他們建構過程中內心說不出的曲折。

三十年前我提倡新史學，期望史家能從歷史的表層看到它的內裡。當時將歷史分作骨骼和血肉兩大部分，傳統史學重視的政治、軍事、外交、社會和學術屬於表層，新史學增益的生活禮俗、生命心態算作內裡，¹²¹ 頗引起一些年輕學者

Martines en Messina，東亞圖，1587；(XI) Antonio de Herrera，“Descripcion de las Indias del Poniente”（東亞南洋圖），1601；(XL) Fernão Vaz Dourado，“Nesta Folha esta Lamcado”（東亞圖），1571；(XLI) Fernão Vaz Dourado，“Nesta Lamina esta Lamca”（東亞圖），1573；(XLVII) Cornelis de Judaeis，“China Reg Nvm”（東亞圖），1593；(XLVIII) Cornelis Doetsz，南洋鐵路圖，1598；(LIII) Hakluyt-[Molyneux of Lambeth-Edward Wright]，世界圖，1598-1600；(LV) Gabriel Tatton，平面世界圖，約1600；(LVI) Pauli G. F. P. N. Merulae，“Totius Orbis Cogniti Universalis Descriptio”（兩半球世界圖），1605。

¹¹⁹ 參中村拓，《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III》，頁XXII。無名氏，“Orbis Terrarum a Hydrographo Hispano”（西班牙製平面世界圖），1573；(XLVI) Joan Martines de Messina，東亞圖，1591。

¹²⁰ 南北分稱者參看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頁26，“Map of China, Cauchin china, Camboja”(1596)；頁133“La China”(1656)；頁134“The Kingdom of China”(1627)，二名合稱者參頁30“II Regno China”(1682)；或者北港與福爾摩沙合稱，見頁54“China Vetero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1652)。

¹²¹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臺北）3:4（1992年12月），頁95-116，收於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22-37。

的興趣。這些年來臺灣史學界在新史學的開拓的確獲得不小的成績，然而隨著個人的年齒日長，涉世愈深，愈發對歷史的內裡有不同的想法。內裡，深入到骨子裡，製作「歷史」的史家的骨子，也包含閱讀「歷史」者的骨子。文獻所記載臺灣史開端的難題「流求」，過去參與論戰者多屬於實證史學家，即使奠基於可信史料，但同樣的史料卻會得出天南地北的結論，原因就出在「內裡」上。

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重視史料，百餘年來發展出精細入微的考證方法，形成理論、概念或觀點，他們相信只要史料可信，寫成的歷史便真實，至少接近真實。大原則上固無可厚非，然而在汗牛充棟的史料中，歷史家選定的課題便存有主客觀的機遇性；而這個課題的結論之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同樣也需有主客觀多重條件配合，方才可能。

將中國傳統典籍的「琉球」牽連到當今的臺灣，本文開篇說過，始於法國漢學家德理文 1874 年發表的論文，當時法國勢力進入越南已超過百年，德理文寫作的緣由，個人學術思想的因素固容再考，但當時國際大勢之影響亦不能排除。他的論文中明言：福爾摩沙的重要性及其地理位置已引起密切的關注，又說其住民不同於中國人，引起人們對他們的國家認同和民族來源探索的興趣。¹²²

近代國際情勢變化突顯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當時法國考慮在東亞的利益絕對不會缺席，十年之後甚至掀起清法戰爭。一個對東方學術具有發言權的學者，想必不可能自外於時代吧？這恐怕是德理文取材於《文獻通考·四裔考》而論述琉球的契機，否則漢學的領域那麼廣大多樣，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的他何獨選取這個小眾的課題？更想不到竟然會開啟東亞史學界一百多年的長期爭論。

過去歷史的課題與當下史家的關懷分不開，這是歷史作用之所在，中國傳統史學謂之「知人論世」。屬於流求臺灣說的市村瓊次郎，研究唐以前的福建與臺灣，雖然是針對一千多年前閩臺關係的歷史進行實證「客觀」研究，他也坦言這

¹²² “L’importance de Formose et celle de sa position géographique m’ont paru dignes de quelque attention. Les details minutieux que fournit Ma-touan-lin sur l’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qui habitaient cette partie de l’Orient, aux premiers siècles de notre ère, details recueillis sans doute de la bouche des nombreux prisonniers emmenés en Chine, donnent un intérêt particulier à l’identification de leurs nationalités et à la recherche de leurs origins.” See 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 p. 119.

個課題不論現在或將來，凡有志於國家之經營、議論的人，應該多加注意。¹²³

荷蘭漢學家施古德接續德理文，更明確提出臺灣說，圈內同行對話本來就是學術界的傳統。他說：「中國史乘中所誌諸國，最混淆不分、使東西方地理學者疑莫能解者，莫逾於琉球。」也許是「內在理路」之故，真是被他說中了，雖然他為文時還看不到後來那麼熱鬧的場面。不過，他的長文有一句非關考證的「閒話」，倒映照出所謂實證史家內心深處的奧秘。他說：「中國此種無信無理之攻擊，又何怪臺灣人後來之報復耶？」¹²⁴ 這裡的「臺灣人」，採用馮承鈞的翻譯，原文作福爾摩沙人。荷蘭人施古德想到早他二百多年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嗎？當時記錄，福爾摩沙人倒真是原住臺灣人，和福建來的「中國人」截然區別；如施古德所主張陳稜到的流求是臺灣，那麼流求國人當然該稱作 Formosans。

通常實證史家不喜歡在學術著作抒發感慨，申論題外的「閒話」。然而歷史研究不管多麼強調理性或中性，一旦涉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原則（或價值判斷），歷史家該放棄價值，退讓原則嗎？隋帝國征伐虜獲流求國人，師出何名？這個海外島國何嘗招誰惹誰？《隋書·陳稜列傳》明明記載：「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單純的流求人還以為中國兵是來做買賣的呢！然而「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打。流求國王遣兵拒戰，不敵，於是國亡人俘。陳稜班師回朝，獻俘七千，煬帝將流求男女「頒賜百官」當奴隸。如果唐人張鷟《朝野僉載》的記載可信，上一次朱寬出征留仇（流求）國，俘虜男女千餘人，「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鎖，恐其道逃叛。」這筆帳也算上去，這個所謂的禮義之邦，堪稱文明國度嗎？

施古德不只對中國批判，也同樣批判他自己的國家，接著批評說：「至葡萄牙〔按：當作西班牙〕人及荷蘭人之待遇此種可憫的蠻人，其殘酷亦不在中國人之下也。」¹²⁵ 可憐的原住民被鄙視欺凌之餘，還相信仁慈的敵人是優越的種族

¹²³ 市村瓊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頁 1-25。

¹²⁴ “Est-il étonnant qu’après une attaque aussi perfide et non-motivée, les Formosans exaspérés aient plus tard tiré vengeance de l’insulte que leur avait fait la Chine?” See Gustave Schlegel,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 p. 203. 亦參希格勒著、馮承鈞譯，《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卷 19 〈古琉球國考證〉，頁 183。

¹²⁵ “Le rôle joué par les Portugais et les Hollandais n’s pas été plus beau que celui joué par les Chinois, et on va après vilipender ces pauvres barbares qui étaient vraiment assez payés pour avoir eu confiance en la bonne foi des races supérieures (!)” See Gustave Schlegel,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呢！施古德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民族主義史學家做得到的。

民族主義史學家多看到本民族的善而忽略惡，施古德固不至於此，他對隋帝國的批評，頗使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近現代中國史學家無法釋然，長年鑽研「流求史」的梁嘉彬（1910-1995）即是最鮮明的例子。由於施氏是流求臺灣說的首倡者，梁氏轉而根據他的「閒話」指責臺灣說者居心叵測，批判的對象尤其針對日本學者。他說：

主臺灣說，最早係由御用學者參據歐西學說粗工製成，其後有盲從附會論，……以之強證臺灣自古為琉球與倭之別種，經隋討伐，乃幾盡墟其國者；且又以之侮蔑中國古代航海工具技術之幼稚，與夫滅人國族之慘無人道也。¹²⁶

歐西學說當指施古德。從中國古代航海技術解釋「流求」、「琉球」相關史料，日本學者大有人在，由於航海牽涉風力與潮流，據史籍日數而估算的里程並不絕對，而且只憑隋軍最後幾天的航程，不論中國古代航海技術先進或落伍，加上個別的天候情況，都不是可以作為甄別「流求」所在的有效方法。至於滅人國族的罪行，正史記載明白具在，除非能辨證史料不實，否則無所謂「強證」的主觀性問題。

一種理論，或一個概念，不論形成的過程如何中性客觀，在不同的時代或地區，經由不同人轉手運用，往往會產生兩極化的效果。這種歧異在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形成以後的近現代特別明顯，所以「流求即是臺灣」這個命題，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在中國與臺灣很早就跳躍到「臺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論調，且不說北京的政治宣傳、中國國民黨的史觀，歷史教育至今仍然倡言隋煬帝、甚至三國孫權時，中國人早就到過臺灣，非把這個尚存爭議的「歷史」寫入教科書不可。但同樣的史料，梁嘉彬則苦口婆心勸人放棄臺灣說，再三說隋與臺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 p. 203, 馮承鈞譯文不全，茲依文義補之。

¹²⁶ 梁嘉彬，〈流求辨：敬質「隋代流求為臺灣」之論者〉，《中央日報·學人》67（1958年8月5日），收於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199。

灣無關連，因為他深怕持此論者，「以愛臺灣之心而反有貽害於臺灣也」。¹²⁷

梁氏何以斷言臺灣說會產生愛之反而害之的後果呢？因為他認為日本「御用學者」流求臺灣說是有用意的。日治中期，鈴木讓受臺灣總督府之委託，彙集多種臺灣方誌編輯成《臺灣全誌》（1922），其卷首〈例言〉云：

臺灣古稱琉球，隋伐之，……《唐書》則為多尼，《日本書紀》總稱沖繩以南列島為多禰，後改南嶋。持統帝時（686-697）遣文忌寸等求蠻所居，文武帝時（697-707）又遣文忌寸等覓國，因給戎器，而其翼年，信覺（原注：訓志賀岐〔レガキ〕，即シガキ）、度感（原注：訓太古〔とく〕）等來貢。信覺者，石垣島也；度感與多尼音近。如呼此嶋者，智證之為咬人國，空海之為虎性，《狹衣日記》之為宇留麻國者，蓋皆臺灣也。¹²⁸

這段文字頗取材於新井白石的《南島志》（1719），新井氏值十八世紀初，還沒有臺灣割讓日本殖民的事，貼不上「御用」的標籤。當然兩百多年後的歷史情境完全不同，按照鈴木氏鉤勒的歷史圖像，日本殖民者倒也可以學當今北京的口吻說，「臺灣是日本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從梁嘉彬的眼光看，戰後撤退來臺的國民黨政權力主將隋之流求和三國之夷州寫入臺灣歷史，不過徒逞意識形態，少有深厚的學識可言，甚至他們根本不懂日本臺灣說者的居心叵測。

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不只《隋書》流求國是今之臺灣，《三國志·吳主傳》的夷州也是臺灣。黃龍2年（230），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而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不過吳國也付上沉重代價，「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三國志·全琮傳》）萬人甲士死亡十之八九，剩下一、兩千人，卻能俘虜數千人，其戰績不無令人起疑。

吳軍所到的夷州，同時代的沈瑩撰有《臨海水土異物志》，今只剩部分文字收入《太平御覽》（卷780），可以略窺夷州人的社會和文化。《隋書》流求國已夠模

¹²⁷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5。

¹²⁸ 鈴木讓主編，《臺灣全誌》（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22），第1本，〈例言〉，頁3。

糊了，《臨海水土異物志》的夷州更甚，其文化的描述更籠統，又完全缺乏行軍路線和里程的記錄，但中國學者幾乎毫無異議地咬定三國的夷州即是臺灣，並且說：「這是中國政府的勢力第一次達到臺灣，其歷史意義是十分深遠的。」¹²⁹ 此說如果成立，中國軍隊之入侵臺灣將比隋煬帝提早二百八十年，更能符應「臺灣自古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之宣示了。

但在梁嘉彬看來，臺灣說是兩面刃，既可為中國的領土宣示張目，也會引起臺灣人對中國的疏離和敵視。上世紀五〇年代初，日人國分直一評述戰後臺灣的歷史學與民族學界，說到梁嘉彬的琉球論述，懷疑其動機呼應中國方面的要求，給人並不純粹的印象。¹³⁰ 此時琉球在聯合國託管、美軍佔領、主權歸屬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同屬實證派的國分氏之質疑，似乎反應他也考慮到學術表層之下，還存有其他的複雜因素。但揭舉純學術大旗的梁嘉彬則嚴正聲明，國分誤解他，「謂余著作動機係要求琉球主權，實是冤枉，蓋余已屢言討伐關係不能構成主權之歸屬也。」¹³¹ 梁氏的意思很清楚，他主張隋煬帝派兵攻打沖繩，不意味中國對她擁有主權，也絕無意圖否定二戰後聯合國對沖繩的處置。

梁嘉彬謂討伐無關主權歸屬的看法，正確無誤。試想，無理無由出兵征服別國，俘虜人口，掠奪物資，已為文明世界所不容，怎可能藉無名之師的侵略反而宣示擁有當地的主權呢？這是什麼樣的道德標準！若硬作主張，世界會淪為什麼樣的秩序！

堅持琉球說的梁嘉彬，既然不存中國擁有琉球主權的念頭，在意識形態層次，日本的臺灣說者（至少一部分）是否相對的也不是他口中的「御用學者」呢？臺灣說的健將，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田清是梁氏的業師，自述其研究動機說：「琉球、臺灣皆是邊境外的小土，實際上長久以來被忽視，學界亦然，國史家（日本史）和東洋史家（中國史）都忘卻她們，遂不得究明真相。」所以臺灣說雖然早

¹²⁹ 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代自序〈一部記載有臺灣歷史的最早著作〉，頁 1-16。輯校者張崇根連繫《臨海水土異物志》和清人關於臺灣土番的記錄，夷州語民人稱作「彌麟」，他說即是《諸羅縣志》等的「貓鄰」，「其含義均指已成丁的青年。」其論斷大有問題，本文不予討論。

¹³⁰ 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於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東京）11:2（1951年3月），頁 160-171。

¹³¹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 200。

經施古德提出，他仍覺得有必要利用多方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¹³² 然而就這麼「純學術」而已嗎？

當二十世紀二〇、三〇年代之際，琉球說或臺灣說筆戰方殷時，琉球說主將秋山謙藏發表〈流求即臺灣說成立的過程〉，¹³³ 提供我們觀察實證研究之內裡的面目。這是一篇梳理日本東洋史學的文字，尤其以臺灣、琉球、朝鮮、滿洲的研究為核心。他說，明治維新以後，由於日清和日露兩次戰役，前者使日本領有臺灣，後者則從俄羅斯繼承南滿的權益，開啟日本帝國北進和南下的戰略。由於國家資本的投入，社會作為奧援，滿蒙朝鮮的調查和歷史地理研究急速發展；臺灣雖完成土地、人口調查，歷史研究卻相對不振。透過臺灣總督府的資助，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發行的《東洋學報》和《史學雜誌》遂出現一系列夷州、流求的論述。秋山言外之意似乎指責臺灣說也不那麼純粹吧。

臺灣的實證史家又如何？承繼日本史學傳統的曹永和即屬於臺灣說者。曹氏秉承嚴謹學風，六〇年代發表早期臺灣史的長文，「自散見於各書的零文短語，多方推求，虛心考究」，幾乎網羅可能與臺灣早期歷史有關的文獻史料，希望藉此「獲知吾先民之活動情形的大概。」¹³⁴ 其論述鋪陳中國與臺灣的紐帶早已有牢固的基礎，這是「臺灣島史觀」形成前的曹永和。實證史家的史觀必然具備堅實的史料基礎，然而和日本的臺灣說者一樣，難脫大時代的氛圍，在戒嚴體制下，曹氏的研究可能容許違反國策或當局意識形態嗎？官方主流論述在學術界則以郭廷以為代表，不需嚴肅論證就斷定夷州、流求都是臺灣；倒是方豪，在支持臺灣說之餘還有一些保留。

當今自由世界的學風，一旦牽涉到國家領土主權，潔身自好的史學家都想撇清，深怕現實政治污染了他的「純淨」學術，尤其是相信史料會忠實呈現歷史的實證派學者，更具潔癖。在臺灣的梁嘉彬面對的史學界幾乎都是主張流求臺灣說者，難免有形單影隻之感；何況他與當局的論述又截然不同，內心的壓力應該不小。他既以實證自負，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從純學術立場」論辯，堅持

¹³² 和田清，〈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頁 106-129。

¹³³ 秋山謙藏，〈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関する第二論〉，頁 511-524。

¹³⁴ 曹永和，〈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頁 73-74。

「私慾偏見應屈服於學術真理。」¹³⁵ 然而「流求該當何處」這個問題之所以不得不辯，他相信「關係臺灣省史之真偽純雜，琉球國史之存亡補削，以及東洋各國史之本來面目甚鉅。」同是外來統治下的這兩個地方，臺灣是「省史」，琉球是「國史」，基本立場已表明。他寫了那麼多文字，頗有孟子「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苦衷，其實暴露了實證史家的焦慮。

梁嘉彬之反對流求即臺灣之說，當他說出「我漢族之於臺灣，實只有開化之恩，全無滅絕之怨」，¹³⁶ 難道不是有了預設？他既無法否定《隋書》，不敢斷然不理會隋軍對流求人的蠻橫暴行，乃加倍努力論證「流求即沖繩」，似可以理解為中國之琉球說者的「微言」吧。從這個課題，我們看到實證史學表層的科學性，和史家作為國家民族之一員、在特定時空情境下的內心傾向，以及二者衝突或調和的微妙關係。

這位焦慮的史家大半輩子投入「流求」史研究。他為「流求」應該是臺灣或是琉球而焦慮，也為他所信奉的純學術而焦慮。他認為「流求」是琉球，絕非臺灣，四處與人打筆仗，並且一再指責日本學者的立論別有居心，他才是純粹為學術而奮鬥。在「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口號直入雲霄的時代，他察覺臺灣說者「著作動機至為複雜」，不外要消滅琉球國之原史，「把臺灣化為自古與中國分庭抗禮的獨立島國。」¹³⁷ 這時臺灣尚無統獨之爭，但在做「純學術」的討論過程中，這個實證史學卻充斥著迫不及待的焦慮。

與上世紀二〇、三〇年代北大、清華的高材生一樣出色，梁嘉彬就讀清華大學史學系時就撰著《廣東十三行考》，青年才俊，蜚聲學林；畢業後赴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東洋史學科深造，受業於和田清門下，二戰後東京大學頒贈給他舊式的博士學位。不論清華或東大，當時都承繼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嚴格的史料學風，屬於典型的實證史學。1947年梁嘉彬發表〈琉球史論正謬〉，首次提出「流求」琉球說，一反日本主流的臺灣說或臺琉混合說，主張《隋書》

¹³⁵ 梁嘉彬，〈從純學術立場論隋書流求答臺灣論者〉，《中央日報·學人》91（1958年8月5日），見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7。

¹³⁶ 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00。

¹³⁷ 梁嘉彬，〈論「隋書流求為臺灣說」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兼論東吳夷州為琉球說〉，《東海學報》（臺中）1:1（1959年6月），頁101-148，收於梁嘉彬，《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頁219-264。

的流求就是今日稱作沖繩的琉球，而不是臺灣，也不是包含二者的「南島」。爾後二十幾年，梁嘉彬廣泛搜羅各類史料，撰寫學術期刊專業論文和報章通俗或半通俗文字，總計超過三十篇，¹³⁸ 從不同角度伸張他的琉球說，但又與同調的秋山謙藏保持一定的距離。

其實不論臺灣說、琉球說，或者混合說，同一個「流求」卻建構成不同的圖像，而且都經過實證研究，此中不期透露史學存在的本質性問題。我曾指出實證史學健將傅斯年、顧頡剛之論述「中華民族」，乃出於現實考量，難以超脫時空形勢所催生的意識形態與一己的政治立場。¹³⁹ 向來被奉為中國實證史學典範的傅、顧二氏都因國家危機而毅然拋棄承平時期的純粹學術，暴露實證史學的脆弱性。不過別的案例卻又提醒另外的思考，正如幣原坦從寫《南島沿革史論》時（1899）的琉球說，到在《南方土俗》（1931）發表「混同論爭批判」的混合說，他是從臺灣看到可以實證的資料才更改論述的，或者如梁氏所批評來臺出任臺北帝大校長因而改變的呢？同樣的，伊能嘉矩從《臺灣志》的琉球說轉為《臺灣文化志》的臺灣說，是因為當了總督府一個中級「囑託」官員之故嗎？會不會是因為新環境知曉新資料而修正舊說呢？這才是實證史學的信條，「意識」跟著「材料」走，新情境有了新材料，自然產生新解釋，而不是粗魯地受意識形態左右。史學家要深刻自省就在這裡。史學的表層和內裡應該有深沉的辨證，所以流求問題在日本長期存在互相排斥的三說，不見得是簡單的「帝國殖民」一語可以解釋的。反觀梁嘉彬自述他的研究，要「將琉球歷史還之於琉球，臺灣歷史還之於臺灣」，¹⁴⁰ 我們是否也可以借用他的話加諸不同派別者身上，他們又何嘗不是要「還原」他們認為的真琉球史或真臺灣史呢？

戰後梁嘉彬來臺，不像他的胞兄——另一位傑出史學家梁方仲留在中國，處於另一種境遇，即使在戒嚴法管制之下，仍可堅持實證史學的立場，他可以發表與當道意識形態牴觸的論著。還好，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活學活用」歷史，

¹³⁸ 梁氏流求及其相關主要論述，1965年以前者結集成《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一書。其論著詳目請參看黃啟臣、梁承鄴編著，《梁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十三行之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118-124。〔按：此書收集的論文目錄猶有遺漏〕。

¹³⁹ 杜正勝，〈從實證學風談歷史的表裡與內外：史語所九十週年慶賀辭〉，《古今論衡》（臺北）32（2019年6月），頁37-68。

¹⁴⁰ 梁嘉彬，〈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頁321。

只要不涉入現實政治，討論一千多年前的流求問題，尚不致於有立即可見的危險。何況梁氏具有一定的國際聲望，多一張保護傘，即使如此，他的內心依然充滿困擾。1972年梁嘉彬發表〈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連同另一篇論《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¹⁴¹ 算是他對流求問題的最後見解，上距始初的〈正謬〉，整整二十五年之久。在這篇六萬多言的專業考證文字中，作者仍不時流露出內心的煎熬和焦慮，並且著之於文字。

不只日本人主張臺灣說，中華民國教育部審定的標準教科書也主張臺灣說，梁嘉彬簡直無法忍受了，他批評教育部誤以為此乃一種臺灣與大陸連鎖之一最佳說法，何其愚蠢也！梁氏指責標準教科書不理會他的琉球說，反而採用曾經是敵國的學說。他「三十年來，聲嘶力竭，反對盲從」，聲明都是史學正宗的考證，自信有堅強的史料基礎，「非欲為感情之發洩，或政治之利用。」相關著述六十萬言之多，其目的：

只欲以臺灣省史歸諸臺灣，琉球國史歸諸琉球，為學術而爭，為真理而戰而已。

學術研究提高到為真理而戰的層次，堪稱悲壯！梁氏「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慷慨激昂的態度，能說既「不預存成見」，也不「摻雜感情」嗎？這樣獲得的結論可能是「真理」嗎？

梁嘉彬痛惜「中國人蓋無真心實意研究海島史地者」，對日本學者的論著「只有無條件接受」；在他看來，歐洲和日本的流求臺灣說之動機，

不外好奇立異，欲創為新說，又或別存政治因素。國內時賢著作又或通史教科書，但求追隨外人理論，其意以為可藉此為伸展臺灣省史之地，而於不知不覺中已代外人強證中國必曾滅人之國，墟人之地，以致臺灣土族文化，宋元不如隋唐，明清不如宋元。

¹⁴¹ 《隋書》考證之文發表於《大陸雜誌》45: 6 (1972年)，頁1-38；〈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考證：兼考宋前宋後琉球及臺灣澎湖諸島〉，《大陸雜誌》44: 1 (1972年)，頁1-32。上引黃啟臣、梁承鄴的《梁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十三行之一》，〈梁嘉彬傳略〉論著目錄漏收。

原來他還是不願面對中國有滅人國、墟人地的歷史，原來他怕一旦坐實《隋書》流求是臺灣，當今原住民文化之落後是因為曾遭中國人重創，他們的倒退便是中國人的責任了！這樣的考慮不知有沒有違背實證史學的原則？其實他更擔心「臺灣省史與中國國史自古分立，或自古為琉球一部分」，這樣的歷史圖像一旦定型，便可為戰後的臺灣地位未定論找到歷史依據，為臺灣獨立或歸屬日本張目！早在臺灣尚未出現統獨分歧的時期，他的思慮不能說不深遠，然而能說他不帶有領土主權的考量嗎？

不過梁嘉彬仍然一口咬定主張臺灣說或臺琉混合說的人，

一面抹殺清代開化臺灣土族之恩，一面忘（妄？）證捏做華人屠殺臺灣土族之怨，又欲妄製琉球自古代為日本屬島之說，不許琉球自有其歷史之存在。臺灣自古為琉球植民地之說，使之臺灣於日本亦有其間接連鎖關係。¹⁴²

混合說一般把沖繩到臺灣廣大範圍內皆屬於《隋書》流求國，另一種說法是臺灣極南端的原住民瑯嶠族係沖繩之殖民者，總之是琉球臺灣一體。而琉球早已併入日本領土，此一論述豈不是為日本之領有臺灣找到古史的「王道」根據，而不只因為馬關條約的「霸道」？

日本學者「純出自政治動機」猶或可說，最令梁氏氣短者，一般中國人竟然不能辨別琉球臺灣兩地古俗之差異，而「為虎作倀之徒曾或不以我為德，而反以我為仇！」德、仇云云，語意涵蓄而保留，他被打過小報告，被請去喝茶調查嗎？

八、文獻的圖像關聯歷史建構

文獻記載臺灣歷史的開端就是本文所論這個棘手的流求問題，流求是不是臺灣？當然成為講述臺灣史首先要處理的問題，其實也是第一難題。

《隋書》沒有交待「流求」名稱的由來，是自稱或他稱？這兩個漢字是否音譯？也不知名稱的義涵。晚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提出一種解釋說：「或云於

¹⁴² 以上梁嘉彬之文字皆引自他的〈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頁2-12。

古為『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卷 80）安井白石《南島志·序》不以為然，曰：「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為流（原作琉）求。且謂國無文字，豈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的確，《隋書》既然說其國無文字，怎會有中文的海中浮虬之說？我們同意安井氏「不強求其說可也」，但可確定的，「流求」這兩個字是隋人留給後世的，其音是否得自當地人的自稱呢？也不明白。

不過，一直到十四世紀，包含大隅、沖繩和八重山三大列島的琉球尚未統為一國，依然沒有包括全部列島的名稱。當時倭國使臣小野妹子看到隋軍取回的布甲，而說夷邪久用之，並不意味隋人的「流求」即是倭人的「邪久」或「夷邪久」。日本天平勝寶 5 年（753，唐天寶 12 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和吉備真備、唐僧鑑真一行人要去中國，海上遭風，漂流至阿兒奈波（おちなは）島，伊波普猷說，他們大概在沖繩島登陸，認為《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記的「阿兒奈波」當是島民自稱，即沖繩（おきなわ）。¹⁴³ 康熙晚年出使琉球的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說：「琉球土人居下鄉者，不自稱琉球國，自呼其地曰屋其惹，蓋其舊土名也。」¹⁴⁴ 屋其惹，即おきなわ。據幣原坦的調查，今沖繩島民未聞「琉球」之名，土著慣稱「沖繩」。¹⁴⁵

根據《隋書·流求傳》的記載，這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隋煬帝的大軍把他們驚醒。遠望海面上密密麻麻的船隻，他們以為是來貿易，不期被殺個措手不及，敗退死守，王都終於被攻破。隋軍不但獲得許多戰利品，還俘虜舉國男女數千人（一說萬七千口）到中國去當奴隸，但從此中國政府沒再來過。

流求國在哪裡？明初以來所有論述都離不開琉球或臺灣，但陳稜大軍從廣東潮汕出海，而且又選在東北季風盛吹的冬天出發，帆船時代當不可能逆風往北航行，常理而言，應該航向南海才是。張鷟《朝野僉載》的留仇也說另一去流求的事件，朱寬回到南海郡上岸。那麼隋人說的「流求國」位於南海嗎？早期史料這兩個情節向來論者都沒有解釋。這個疑問我始終不能釋懷，也不能確指南海何地。

總之，隋帝國征伐流求是事實，俘獲男女也不假（人數容有出入），而記述

¹⁴³ 伊波普猷，〈隋書に現れたる琉球〉，頁 505-520。

¹⁴⁴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 6 〈琉語〉 結束語，頁 144。

¹⁴⁵ 幣原坦，〈南島沿革史論〉，頁 3-6。

的軍政組織、社會文化情狀和風俗宗教應非憑空想像。這幅歷史圖像不論安放在臺灣或琉球，對兩國歷史的書寫關係都很重大，然而由於流求（琉球）的來由及意義難明，第一手記載的中國人對海洋又相當陌生，致使其地難定，才演出近代學術界追究流求之所在的無終止論辯。此歷史圖像到底是現實的沖繩或臺灣？皆不能完全扣合，再加上政治因素以及延伸的主權主張，牽涉臺灣、沖繩和中國、日本，遂使這個難題益加分歧。

「流求」這個小小案例，教育我們真實歷史的追求有多難！史家不但背負著學術內在傳統的包袱，受到所處之時代潮流，種種有形或無形的影響，還要時刻檢查自己的時代意識以及政府的壓力，凡此層層關卡都是通往「真實」的障礙。一個嚴肅的學者應該承認他提供的只是一種可能，不敢奢談真實的歷史。因為歷史研究多受研究者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左右，在字面看到的「歷史」之餘，字裡行間還藏著史家的內心世界。

回到一千六百年前的歷史現場，在中國東方海上有一個國度，地多山洞，不知由來有多久。這個國家有國王、小王和村社頭人的大小統屬，自相樹立，小王統領一個洞，國王統諸洞，各自具有相當的獨立性。王都無城，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宮門面有十六間（兩柱謂之間）寬，頗稱壯觀，雕刻禽獸作裝飾。民間屋宇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王出巡，乘坐刻成木獸形的肩輿，由人扛著走，前導隨從數十人。小王沒有這麼大的排場，但也乘獸形木几。

此國之人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領袖頭人都要善戰才能勝任。他們的武器不外刀、矛、弓、箭、劍、鉞，因為少鐵，故兵器皆薄小，多使用骨角製作。甲冑用麻紵編織，高貴者則用熊豹皮。國人好相攻擊，諸洞不相救助。戰爭如比武，兩陣對壘，勇者三五人跳出前來叫罵，接著互相攻擊。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和解，收取鬥死者，共聚而食之，將鬪體送到王所，王宮墻壁下，是以多聚鬪體。王乃賜戰勝的勇士冠戴，使為隊帥。

國家平時無賦斂，有事才均等地收稅，刑罰沒有法定準則，臨事裁定。犯罪先由村社頭人審斷，不服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同議決。牢獄不設枷鎖，唯用繩索網綁。死刑則以一尺來長的鐵筋從頭頂鑽鑿殺之，輕罪則杖棍擊打。

這個國家無文字，無曆法，望月盈虧以紀時節，候草藥枯萎而知年終。國無君臣之儀，無拜伏之禮。普通人家也無禮節，父子同床而寢，無男女大小禁忌。其國正式服裝亦頗講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則戴正方形的羅紋白布帽，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走路時其聲如珮。婦女戴一種藤條編織的頭笠，也飾以毛羽；其手足多佩鐺釧，頭掛綴珠，也帶項鍊。

此國之人深目長鼻，頗類北方胡人。男子拔去髭鬚，盡除體毛；婦人手臂刺青，作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作聘禮，簡易者則男女相悅便成匹配。婦人分娩後必食胎盤，並烤火令汗出，五日便平復。

他們用木槽曝曬海水製鹽，榨木汁做醋，釀米為酒，其味甚薄。無筷匙餐具，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奉給尊者。凡有宴會，必待呼名而後飲，王也不例外，上王酒者亦直呼王名。他們銜杯共飲，喝酒後口歌足蹈，一人唱，眾人和，樂音哀怨，扶搭女子上臂，搖手而舞。

喪葬禮俗，死者氣將絕時，舉家至前庭，親戚賓朋哭泣相弔。然後浴屍，纏以布帛，裹以葦草，無棺而葬，上不起墳。父死，為子者數月不食肉；據說其國南方之風俗少異，人死則邑里共食其肉。

這個國家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但無牛羊驢馬。土壤肥沃，耕種先以火燒草木，然後引水灌溉；耕具是石刀，長尺餘，闊數寸。多種稻、粱、黍、麻、豆等，樹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杉、梓，還有竹、籐，水果草藥同於中國江南，風土氣候和嶺南相似。

他們信奉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戰鬥殺人，便將所殺者祭神。神祠不一，沒有廟宇，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

由於古琉球和古臺灣都沒有留下任何自己的記錄，現在只有《隋書》這種外人筆下的〈流求傳〉告訴我們這些歷史圖像。試想想，此一圖像是沖繩或是臺灣，不但彌補她們的歷史空白，而且還牽動現實的國際關係。流求如果就是琉球（沖繩），日本人的立場和琉球人的立場，即使今天他們同屬一國，其論證思維恐怕也不會相同。同是沖繩人，主張沖繩回到琉球王國的獨立派和主張與日本合為一國的統合派，對《隋書》也會有不一樣的理解吧。古琉球作為「變種琉球人」，

完全具有「獨立國家」性格的獨立派，自然與伊波普猷視古琉球為「日本民族之一支族」者截然不同。¹⁴⁶

主張琉球說者所透露的內心世界，其實也是流求論辯值得關注的課題，只是臺灣（或中國）學者對琉球史學相對陌生，難以置喙罷了。當然，臺灣說與我們更直接，更密切，這是上文我們借一個琉球說者對臺灣說的批判，以顯現史家的實證研究雖然「科學」，心路歷程仍相當曲折。

不管實證史家有意識到流求論辯外部的複雜性，這個課題不可能只關在學院象牙塔內，只供同行自己玩，才是不爭的事實。儘管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古代史距離我們又那麼遙遠，但臺灣史開篇遇到的「流求」問題和當今臺灣人卻那麼貼近。所謂臺灣的發現和主權歸屬，在臺灣這個政治分裂的社會，不同立場的人往往接受不同的歷史圖像而形成定見。概略言之，統一派（或中國派）傾向於流求即是臺灣，獨立派（或本土派）則持相反的或存疑的態度。戒嚴時期國民黨主政，教科書宣達的官方說法毫無疑問屬於前者，九〇年代臺灣民主化後，尊重不同的學術解釋，教科書容有比較多樣的論述，不過所憑藉的課綱仍然是爭議的焦點。歷史課綱容易淪為政治角力場，這難題無需諱疾忌醫，正直面對，在自由民主國度是可以把意識形態壓到最低限度的，人民可以根據資料可信度和論證合理性而採其所信。

其實臺灣怎樣被發現而載入史冊的，長期以來是一個謎，不要說遙遠的西洋，即使只相隔一條海峽的古老文明中國，直到非常晚近，才對她有清楚的認識。考查今存的中國古地圖刻石，東、南海域的島嶼有很明確的海南島，卻無臺灣；較早雕板圖籍，在今日江、浙、閩、粵的東方海面，則扶桑、日本、琉球、倭奴、瀛州、毛人諸島嶼錯置。¹⁴⁷ 這些史料都證實本文開篇所說中國人對東方海洋之模糊，不可能建立中國統治過臺灣的說法。清朝初年朝野才都認為「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始入版圖」。¹⁴⁸ 這一真實的歷史敘述，不能誣指為歌頌愛新覺羅玄

¹⁴⁶ 參吉成直樹，《琉球史を問い直す：古琉球時代論》（東京：森話社，2015），頁8-17。

¹⁴⁷ 刻石如兩宋之際劉豫阜昌7年（1136）的「華夷圖」、南宋紹興12年（1142）的「禹跡圖」、南宋淳祐7年（1247）「地理圖」；雕板圖籍如北宋宣和3年（1121）的「東震旦地理圖」，「今古華夷區域總要圖」。參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7）。

¹⁴⁸ 劉良璧主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引雍正元年「諭從優議敘平臺官員」云：「上諭：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朝聖略神威，取入版圖。」劉良璧原著、林衡道主編，《重修福建臺灣府

燁之虛言。

「臺灣」或其音近的大員、臺員、大灣等詞，見諸文獻已經晚至十七世紀，然而中國典籍從七世紀初的《隋書》起，卻不斷記載著東方海上有一個「流求國」，是不是臺灣呢？因為十七世紀以下，中國人才開始移民臺灣，中國政權才開始統治臺灣，士大夫才到臺灣來，從他們對原住民的記述，他們也沒把《隋書》的記錄考慮進來。

臺灣的信史還是要從十七世紀算起，正如作為政權的琉球從十四世紀算起一樣，在此之前的流求，雖然存在，唯不同時代、個別見聞可能不同，官書記載和民間傳說也不可能一樣。隋之流求的所在，在有力的新史料出土之前，我們還是認為不強求可也。

後記

大約十年前，我撰寫〈臺灣歷史圖像的表層和內裏：特就「流求」論〉，發表於《臺灣風物》（第63卷第3期，2013年9月）。此文呈現我晚年的一些史學思想，借流求論辯分析史學在表層底下的曲折過程。然而該文對於流求論史掌握不夠充分，學派的歸類頗有所錯置，論證猶有不足，論述也不夠周到，頗覺愧對讀者，遂決定放棄舊作，重新改寫。提醒學者，傳統中國對東方海面的了解嚴重不足是論證紛爭的根源。我希望新作辨證學派異同論證更加完整充實，史料分析更加深邃細膩；完成之後，篇幅增倍，庶幾稍稍彌補前失。此文寫作於罹患坐骨神經疼痛期間，來回於書桌與臥榻，寫寫停停，於我個人得未曾有，但也是一件可堪告慰的小事。是為記。

2022年4月20日於史語所

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14-15。其他清人認為臺灣自古不通中國之資料甚多，略參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181-185。

引用書目

- 杜正勝，〈第三講「海國觀點的世界秩序」演講〉，國立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2020 年 12 月 4 日），出版中。
- 鄭舜功，《日本一鑑・浮海圖經》，民國 28 年（1939）據舊鈔本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 〈越南歷史〉，「維基百科」，下載日期：2022 年 11 月 2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6%8A%E5%8D%97#%E6%AD%B7%E5%8F%B2>。
- アグノエル（Haguenaer, M. C.）
- 1931 〈隋書の流求を臺灣に比定せんとする一試案に対する批判〉，《歴史地理》（東京）58(5): 86-88。
- 上村俊雄
- 2004 〈沖繩の先史、古代：交流、交易〉，收於鹿児島国際大学附置地域総合研究所編，《沖繩対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 1-72。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于雅樂（Imbault-Huart, Camille）（原著）、郭維雄（編譯）
- 2019 《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山里純一
- 1999 《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
- 中村拓
- 1967 《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III》。東京：東洋文庫。
- 中村明蔵
- 2004 〈古代の沖繩と《隋書》流求伝：六～七世紀、沖繩史への接近〉，收於鹿児島国際大学附置地域総合研究所編，《沖繩対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 121-153。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 中馬庚
- 1897 〈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史學雜誌》（東京）8(11): 1066-1093。
- 1897 〈臺灣と琉球との混同に付て〉，《史學雜誌》（東京）8(12): 1187-1205。
- 方 豪
- 1956 〈陳第東番記考證〉，《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臺北）7: 41-76。
- 1969 〈陳第東番記考證〉，收於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1994 《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市村瓊次郎
- 1918 〈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東洋學報》（東京）8(1): 1-25。
- 甲野勇
- 1937 〈隋書「流求國傳」の古民族學的考究（豫報）〉，《民族學研究》（東京）3(4):691-702。
- 白鳥庫吉
- 1930 〈夷洲及び亶洲に就いて〉，《史學雜誌》（東京）41(12): 24-48。

- 1935 〈隋書の流求國の言語に就いて〉，《民族學研究》（東京）1(4): 595-618。
- 石守謙（主編）
- 2003 《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伊波普猷
- 1926 〈隋書の流求に就いての疑問〉，《東洋學報》（東京）16(2): 246-280。
- 1926 《孤島苦の琉球史》。東京：春陽堂。
- 1974 〈隋書に現れたる琉球〉，收於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頁 505-520。東京：平凡社。
- 伊能嘉矩
- 1928 《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
- 1985 《臺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明治 35 年[1902]排印本影印。
- 1994 《臺灣文化誌》，卷上。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吉成直樹
- 2015 《琉球史を問い直す：古琉球時代論》。東京：森話社。
- 江樹生（譯註）
- 2000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
- 吳培基、賴阿蕊
- 2011 〈元代汀路尾澳及琉球國考證〉，收於紀麗美總編輯，《澎湖研究：第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63。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希格勒（Schlegel, Gustave, 施古德）（著）、馮承鈞（譯）
- 1928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上海：商務印書館。
- 李壬癸、土田滋（Shigeru Tsuchida）（合編）
- 2001 《巴宰語詞典（*Pazih Dictionary*）》。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李 昉
- 1958 《太平廣記》，第 10 冊。臺北：新興書局。
- 李 復
- 1971 《滄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杜正勝
- 1992 〈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臺北）3(4): 95-116。
- 1998 《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
- 1998 〈「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3）〉，《大陸雜誌》（臺北）96(3): 1-15。
- 2004 〈什麼是新社會史〉，收於杜正勝，《新史學之路》，頁 27-37。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2019 〈從實證學風談歷史的表裡與內外：史語所九十週年慶賀辭〉，《古今論衡》（臺北）32: 37-68。
- 汪大淵
- 1975[1350] 《島夷誌略》，影印光緒 18 年[1892]順德龍氏知服齋刊本。臺北：學生書局。
- 周致中（撰）、陸峻嶺（校注）
- 1981 《異域志》。北京：中華書局。

周婉窈

2007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臺北) 40: 93-148。

周學普(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6 《臺灣經濟史三集：臺灣島史》，臺灣研究叢刊第34種。臺北：臺灣銀行。

和田清

1924 〈琉球臺灣の名稱に就いて〉，《東洋學報》(東京) 14(4): 558-581。

1931 〈再び隋書の流求國について〉，《歷史地理》(東京) 57(3): 1-34。

尚象賢(撰)、沖繩縣教育庁文化課(編集)

1982[1650] 《重新校正中山世鑑》。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

服部四郎、仲宗根政善、外間守善(編集)

1974 《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卷》。東京：平凡社。

林豪

1963[1884] 《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空海(著)、渡邊照宏、宮坂有勝(校注)

1965 《三教指歸：性靈集》。東京：岩波書店。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編)

1986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北京：中華書局。

後藤雅彥(著)、邱鴻霖(譯)

2008 〈從沖繩考古學的現狀看與臺灣考古學的接點〉，《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臺北) 68: 137-148。

柳宗元

1983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收於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80，頁5859a。北京：中華書局。

秋山謙藏

1928 〈Goresなる名稱の發生とその歴史的發展〉，《史學雜誌》(東京) 39(12): 233-256。

1928 〈Goresは琉球人である〉，《史學雜誌》(東京) 39(3): 268-285。

1929 〈隋書流求國傳の再吟味〉，《歷史地理》(東京) 54(2): 93-126。

1931 〈流求即臺灣說成立の過程：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二論〉，《歷史地理》(東京) 58(6): 511-524。

1932 〈流求即臺灣說再批判：隋書流求國傳解釋に關する第三論〉，《歷史地理》(東京) 59(1): 37-71。

胡宗憲

1983 《籌海圖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胡建偉

1961[1771] 《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茅元儀(輯)

1987 《武備志》，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臺北：華世出版社。

徐葆光

1997[1721] 《中山傳信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74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翁佳音

1992 〈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臺北）42(4): 145-188。

國分直一

1951 〈戰後臺灣に於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東京）11(2): 160-171。

張之翰

1983 《西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張崇根

1981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北京：農業出版社。

張 燮

1975 《東西洋考》，光緒 14 年（1888）秋月長沙惜陰書局重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曹永和

1963 〈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臺北文獻》（臺北）3: 1-51。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8 〈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收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3 輯，頁 283-312。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2000 《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曹婉如等（編）

1990-1997 《中國古代地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梁嘉彬

1947 〈流求史論正謬〉，《國防月刊》（臺北）4(4): 12-20。

1958 〈流求辨：敬質「隋代流求為臺灣」之論者〉，《中央日報·學人》67。

1958 〈從純學術立場論隋書流求答臺灣論者〉，《中央日報·學人》91。

1958 〈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臺灣文獻》（南投）9(2): 1-16。

1959 〈論「隋書流求為臺灣說」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兼論東吳夷州為琉球說〉，《東海學報》（臺中）1(1): 101-148。

1965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東海大學。

1972 〈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考證：兼考宋前宋後琉球及臺灣澎湖諸島〉，《大陸雜誌》（臺北）44(1): 1-32。

1972 〈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大陸雜誌》（臺北）45(6): 1-38。

盛清沂

1975 〈宋元臺灣史事考〉，《新時代》（臺北）15(7): 3-7。

連照美

1998 〈七世紀到十二世紀的臺灣：臺灣鐵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臺北）53: 1-11。

郭廷以

1954 《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

陳仁錫

1986 《皇明世法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陳有貝

2005 〈從古琉球的歷史發展看臺灣〉，收於陳仲玉、潘建國主編，《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頁304-314。連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陳侃

1966[1534] 《使琉球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1集（據明嘉靖刻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陳宗仁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臺北）21(2): 249-278。

陳漢光

1955 〈「琉求傳」與「東番記」〉，《臺灣風物》（臺北）5(11/12): 1-5。

1970 〈唐宋時代的流求文獻〉，《臺灣文獻》（南投）21(4): 13-16。

勞費爾（Laufer, Berthold）（著）、杜正勝（譯）、劉崇鉉（校訂）

1975 《中國與伊朗：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喜田貞吉

1929 〈隋書の流求傳に就いて〉，《歷史地理》（東京）54(3): 197-198。

曾我部靜雄

1932 〈所謂隋代流求に就いての異聞二つ〉，《歷史と地理》（東京）29(1): 70-74。

費信（著）、馮承鈞（校注）

1962 《星槎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黃省曾

1967 《西洋朝貢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

黃啟臣、梁承鄴（編著）

2003 《梁經國天寶行史述：廣東十三行之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寬重

1986 〈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57(3): 501-510。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宗性、虎関師鍊（編）

1930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元亨釋書》，《國史大系》第31卷。東京：吉川弘文館。

新井君美

1989 《南島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甘雨亭叢書。

楊英（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鈴木讓（主編）

1922 《臺灣全誌》，第1本。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

幣原坦

- 1900 《南島沿革史論》。東京：富山房。
 1931 〈琉球・臺灣混同論争の批判〉，《南方土俗》（臺北）1(3): 1-20。
 1938 《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

趙汝适（撰）、馮承鈞（校注）

- 1962 《諸蕃志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趙孟頫

- 1965 《松雪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元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劉良璧（原著）、林衡道（主編）

- 1977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芳如、鄭淑方（主編）

- 2019 《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増田勝機

- 2004 〈習俗からみた琉球の対外関係〉，收於鹿兒島国際大学附置地域総合研究所編，《沖繩對外文化交流史：考古学・歴史学・民俗学・人類学の視点から》，頁 193-220。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蔡美倩（主編）

- 2011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ブラン島之記・編譯本》。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蔡美倩（主編）、蔡錦堂、鍾淑敏（編譯）

- 2011 《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ブラン島之記・愛書覆刻本》。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戴麗娟

- 2019 〈導讀〉，收於于雅樂原著、郭維雄編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頁 xx-xxii。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韓愈

- 1983 〈送鄭尚書序〉，收於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556，頁 5626b。北京：中華書局。

藤田豐八

- 1936 〈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記錄〉，收於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 348-356。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 《島夷志略校注》。北平：文殿閣書莊。

譚其驤（主編）

-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5 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

- 1993 《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

Campbell, Rev. WM.

- 2001[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Dalboquerque, Afonso

1970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so Dalboquerque, Second Viceroy of India*, ed., with Note and an Introduction, by Walter de Gray Birch. New York: Burt Franklin.

de Saint-Denys, Le Marquis d'Hervey 德理文

1874 "Sur Formose et sur les îles appelées en chinois Lieou-Kieou."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6: 105-121.

1876 *Ethnographie des peuples étrangers à la Chine, ouvrage composé au X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par Ma-Touan-Lin*. Genève: H. Georg.

Hirth, Friedrich 夏德 and W. W. Rockhill

1911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

Laufer, Berthold

1919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Riess, Ludwig

1897 "Geschichte Formosa." *Mitt. der Deutschen Ges.* Tokyo °

Schlegel, Gustave 施古德

1895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XIX. Lieou-Kieou-Kouo 琉球國, le Pays de Leou-Kieou." 《通報》*T'oung Pao* (Leiden, E. J. Brill) VI: 165-215.

Liu-k'iu and “Liu-k'iu Hypotheses”

Cheng-sheng Tu

ABSTRACT

The so-called “Liu-k'iu Hypotheses” relates to the arguments in medieval Chinese classics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whereabouts of the state of Liu-k'iu, whether it's referencing the modern day Okinawa, derived from the narrative developed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r Taiwan, or both, this is a topic of intense discussion of the past a century and half without a definite conclusion to this day, and an ongoing one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It is however, a small topic embodied in the grand scope of history as it doesn't confine itself within the realm of academia, it also invokes disputes as far as realpolitik is concerned. The classic references of the invasion of Sui Empire in *Book of Sui* not only filled the historical void left sinc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aiwan and Okinawa, in a sense it also affects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claims concerning China, Japan and Taiwan. This unique phenomenon has consequently reflected on th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viewpoints of these nations.

Through exploring their origins and dissecting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fundamental methods involved in forming their respective narratives, as well as discovering the hidden agendas within the subconsciousness,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the major three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is issue, the “okinawa hypothesis”, “the Taiwan hypothesis”, and the “hybrid hypothesis”.

The argument,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it can be determined imminently. As for academic aspiration, without the evidences of new and unseen materials, it remains unsolved. This thesis does not take sides, conversely it aims to reflect the complexity and intrinsically involved in this historical argument.

Due to the unfamiliarity and taboo imbu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wards sea and ocean, the studies have been scarce and opaque in the past. If my actual standpoint is to be rendered, I would say that we don't have to forcibly pinpoint the exact location before Ming Dynasty.

Keywords: Liu-k'iu, Liu-k'iu Hypotheses, Southern Islands, The Surface and Intrinsically of History